

非賣品

金東平著

延安歸來

俞先生

高允斌



致贈

指正

發行人 高允斌  
印刷者 商務日報社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832901

b33609445

延安

金東平著

王民信教授贈

羅志新先生贈書



發行人 高允斌

印刷者 商務日報社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一日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2832901



# 延安歸來目錄

金東平著

高九斌先生序·····	一——四
我怎樣去看延安·····	一——六
『陝甘寧邊區』的地域和人口·····	七——一六
中共的『黨』『黨員』和『黨的幹部』·····	一七——三一
中共的『民主』政治·····	三二——四五
中共的養兵練兵帶兵與用兵·····	四六——五八
中共的財政與經濟·····	五九——七〇
中共的宣傳教育與社會生活·····	七一——八六
附錄一	
我們還要再加努力·····	八七——一〇八

延安歸來目錄

前言

兩度過西安

克難坡三日記

由重慶望延安

結語

附錄二

西行漫談

(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在中央廣播電台播講詞)

一〇九—一二八

延安歸來目錄

全書本名

二



# 高允斌先生序

商務日報自民國三年創刊，到現在已經是三十年了，以我國目前報業的情形說來，一個報紙能夠有着三十年的歷史，確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人接辦商務日報之際，正值蘆橋事變，抗戰軍興，一面體念到本報的先進們創業的艱辛，一面又惴懼着今後使命的日益重大，真可以說是枕席難安，每恐殞越。加以七年來連遭敵機十一次的轟炸，使得我們倖存的一點設備，也全都殘缺不齊，我們倚爲唯一收入的營業，更因而日漸減少，可是，我們的物質條件雖然一天比一天的艱苦，而我們的精神却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奮發了。儘管我們全體人員的生活水準降低到不及公教人員的一半，而我們每個人的工作却都要做夠十二小時。因爲我們都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因爲我們都是黨團的青年幹部，因爲我們對於領袖的指示有着堅強的信心，因爲我們對於抗建的前途有着光明的渴望，所以，我們才能夠百折不撓的苦鬥到今天，將我們微弱的力量，全副的供獻於國家民族。本書的作者金東平君，便是我們這一羣青年朋友中的一位最堅強的戰士。

金東平君是三民主義教育中培養出來的一位新聞戰線上的戰士。他對於政治軍事，一貫的有着最高的興趣，在本報五年多的工作表現中，確是站在黨團的立場上供獻出了他最大的力量。尤其是他對於新聞工作的執忱，苦幹苦學的精神，更是深得本報全體職工的敬佩。這次他代表本報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延安之時，我曾經向他說：「共產黨的理論，我們是任何時候都可以研究的，而中共的真實情形，我們却很少看到的機會，希望你在延安能夠多從組織事實方面去觀察一下，以供我們的參考」。這一點，金君確實是做到了的。所以，當他從延安歸來之後，便深感到帶來的新聞並不能發表。

新聞的報導，固然貴乎忠實，可是新聞的報導，却也不能夠沒有立場。我們雖然並不否認中共也有着它的長處，可是，它的這些所謂的長處，却正是從我們顧及不到的疏忽之點學來，如果宣揚他這一套編好的把戲，照着中共的宣傳材料直抄，它正有着新華日報在，用不着我們來替它捧場；如果寫一篇不好也不壞的『延安遊記』之類的文章，不但表示了作者的低能，並且也暴露了報社的失敗，所以，當金君深感寫稿不易之際，本人便決定了西行的文章不一定要在報上發表



，而囑咐金君寫一本參考消息，以供獻於黨團軍政諸先進的參閱。

現在，金君的這本『延安歸來』已經抱病寫完了，內容裏雖然沒有什麼驚人  
之筆，而真實兩字，是可以當之無愧的。同時，更因為金君對於中共的看法是透  
過他自己的政治觀點的，所以行文着筆也就比較明顯。不過金君爲了長期從事於  
新聞事業，很少參加過所謂政治活動，因此，他在這本書裏對於中共的看法，也  
祇是一個國民黨黨籍的新聞記者的報導。內容如有所偏激不到之處，尚望黨團先  
進們予以不客氣的指導。

商務日報社社長高允斌 三十三年九月一日寫於重慶

高允斌先生序

三四



# 延安歸來

金東平著

## 我怎樣去看延安

作者襄助商務日報社長高允斌先生從爭於編輯工作，匆匆的已經經過了五個年頭，在這五年之中，爲了要站在黨的立場上對外宣傳的關係，時時的感覺到自已對於中共認識的不夠切實，這次得以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延安去住了一個多月，在個人說，實在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所以，當作者由重慶乘機起飛時，雖然才和任慕蘭同志結婚三日，而內心裏不但沒有感到新婚遠別的悲哀，並且相反的洋溢起一種難以言語形容的喜悅。

在延安，作者僅僅住了一個多月，爲了行動的不能自由，所以，凡是中共想要別人看的，無一事不被迫看過，而作者自己所想看的東西，則一樣也不會看到，在新聞的採訪上說，固然是全盤失敗，可是，由於一個多月的側面觀察的結果，在個人對於中共的認識上，却實在是增進了不少的智識。

## 延安歸來

高允斌先生常對作者總結他十餘年來爲黨團工作和對異黨鬥爭的經驗說：現在來談解決中共問題，早已不在於軍事上的行動或理論上的辯難了。我們目前最迫切的任務，祇有加強黨團的組織力量，建立幹部的實幹作風，才能夠使得中共問題不再存在。這幾句話，在作者進入『陝甘寧邊區』的轄地以後，便深感到其言之中肯。

中共今天在延安所竊據的三民主義的招牌，便說明了『共產主義』之不能適用於中國與毛澤東想要借屍奪舍之企圖。在『新民主主義論』裏，毛澤東雖然強辯着將來的中共仍要實行『社會主義』，但是，這不過是毛氏爲了既已打上『共產黨』的旗號，不得不如此自圓其說，毛澤東內心裏的真正目標，不過僅僅是爲了奪取政權而已。

然而，中共爲什麼到現在仍然能夠生存並且日益長大呢？這一點，可以說是完全由於本黨組織的不夠健全，與幹部的實行不夠徹底，以至於生出腐肉給予了中共以寄生的所在。空穴自然來風，今日中共存在的因素，便建築在我們自己的不努力上。如果本黨能夠加強幹部的訓練與組織，以爲充實地方政治的基礎，則



中共問題，當不難迎刃而解。

凡是到過中共大本營的人士，大概都會感到中共人材的缺乏。因為中共的組織是以工農爲主體，所以除了幾個高級人員以外，大多數都是沒有讀過幾天書的半文盲。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一切都有待於科學的發展，如果要想以這樣的一個文盲居於多數的『政黨』來掌握政權，事實上是必使國家永久淪於萬劫不復之地。現在，我們要想抗戰勝利，本黨實在是有着當仁不讓的義務，今後，我們要想中國富強，本黨更有着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本黨如果要想用全力將中國治好，當前的第一件急事，便是要首先要強化本身實力，促成中共的天然淘汰。

『民主』，是中共一貫利用的口頭禪，『政治競賽』更是中共一貫的騙人工具。我們祇要稍一留心中共的本身組織和政策，便可以看出中共的專制程度是如何的橫蠻，我們祇要稍一注意中共歷年來的措施和行動，便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政治風度』是如何的微薄……所以，中共對於本黨顧及不到的疏忽之處，向來是無微不至的加以攻擊，而對於本黨的一切良好的措施，則無一不極盡其破壞之能事。即以抗戰而言，中共本身不但不積極對日作戰，而祇知襲擊友軍，擴

充實力；並且對於本黨領導全民抗戰七載的功勳，竟然也朦蔽民衆，詆毀無餘。我們如果同這樣的一個『政黨』來談『民主』來談『政治競賽』，真不啻向癡人說夢，與虎謀皮。

所以，作者深深的感覺到本黨如果想把中國治好，首先便得要將中共問題迅速解決。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中共是擁有十幾萬的黨員和幾十萬的軍隊的，要想使其遭受天然淘汰的命運，當然不是一蹴可就的那麼容易。一方面我們要努力加強我們的黨團組織，培養黨團幹部，刷新各地政治，另一方面，我們更要認識清楚中共的優點和劣點，來做爲我們的參考和宣傳的對象。

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共對於本黨的認識，可以說是極端的徹底。而我們對於中共的優點，則多半『諱疾忌醫』而不去深究。所以，作者這次在延安留居的一月多時光裏，對於中共優點的注意，幾佔全部工作時間的百分之七十，而注意中共劣點的時分，則僅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同時，作者對於沿途所見的自己的缺點，也一併的寫在本書之末，藉作改進的參考。



作者這次在延安一個多月的採訪工作，因為要想得到一點實際的材料，以供獻於黨團政軍負責同志的參考，所以，作者所採訪來的新聞，也自然是多數不能發表。本來作者祇準備寫成一本參考消息的，同時作者更顧慮到這樣做法，在報社的本身的利益上，將不免是一種損失，可是當作者剛返陪都時，本報社長高允斌先生却站在黨的立場上，首先向作者提出了這個意見。使得作者的這一願望，竟能夠順利的完成，在個人的友誼上講，作者是應該對於高允斌先生敬致其最大的謝忱的。

本書的印行，既然是祇供參考，所以作者的行文，也就無所避諱。書末附錄一章，更是毫無顧忌的說出了我們對於本黨的願望；雖然內容不妥之處甚多，可是，最低的限度，總可以說是代表了本黨的一個從事新聞事業的黨員的看法或是在本黨黨員主持下的一個報紙的態度。如果這本書裏能有一點一得之愚，足以供當局的參考，則我們自然是欣喜於自己的熱忱有了代價，假若文內有了錯誤的偏見和觀察，更盼望黨團的先進們要不客氣的給我們以指導，使得本黨的一個從事新聞事業的黨員或是本黨的黨員所主持下的一個報紙，能夠更欣喜於自己的見解

延安歸來

六

有了明確的糾正和進步。

最後，對於解決中共問題，作者是有着一個堅強的信念的，在這裏，作者敢大膽的說：「我們不必將中共問題看得多麼嚴重，但是，我們也不要將中共問題看得過於簡單。祇要我們自己努力，中共是沒有存在的因素的」。

三十三年九月一日於商務日報編輯部



## 「陝甘甯邊區」的地域和人口

蘆溝橋事變的爆發，給予了中國共產黨一個空前有利的機會。毛澤東趁着全國軍民都在總裁的領導之下努力抗日的期間，一面打起了『團結』『抗戰』的金字招牌，以欺騙民衆，誘惑青年；一面却拚命的擴黨擴軍，發展實力。七年來悠長的歲月，使得中共又一天天的長大起來。據葉劍英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發表的『中共軍事情況』裏說，中共軍現在敵後所『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已經有十三個軍區，二十二個『行政公署』。但是，中共的這些『抗日根據地』，事實上是時時要遭受敵人的『掃蕩』和『治安強化運動』所威脅的，軍事的氣氛，自然不免較重；至於『陝甘寧邊區』，則除了陝北土共劉志丹高崗等在民國十九年到二十四年的一段時間裏所遺留的幾堵斷壁殘垣，還在兀立着宣揚中共的『游擊戰績』以外，就再也嗅不到一絲一毫的戰爭的氣息。所以，『陝甘寧邊區』所轄的『延安市』，便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大本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主席毛澤東

，就經常的駐在延安，發號施令，用着他的『卓越的政治天才』，把這片土地上的樸實的農民，硬生生地給塗上了一層濃厚的紅色。

『陝甘寧邊區』怎樣『建立』起來的呢？

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羅邁對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發表的『陝甘寧邊區建設簡述』裏說：

『民國十九年，劉志丹高崗同志等在這地方發動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九一八事變後，又創立工農抗日軍，至今，已經是十五個年頭了。

民國二十四年，中共中央率各個主力紅軍北上抗日，會師於此，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呼籲國內和平。中經西安事變，一經中共斡旋，內戰於以停止，和平因以告成。

二十六年，蘇區自動改爲特區，旋改名陝甘寧邊區，停止沒收土地，實行普選的民主政治，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積極作抗日準備，請求國民政府與蔣委員長直接領導。

此時，邊區所轄地區爲：延安、延川、延長、清澗、綏德、米脂、葭縣



、吳堡、神府，（即神求，府谷兩縣之大部），安定、安塞、靖邊、定邊、志丹（即保安），甘泉、鄜縣、淳化、枸邑、正寧、寧縣、慶陽、合水、鎮原、環縣、豫旺、鹽池等二十六縣。面積十二萬九千餘方公里，人口二百萬。經蔣委員長指定與行政院六三三次會議通過，為邊區政府轄治八路軍募補區。

不幸，抗戰一年後，邊區即被數十萬大軍及西起豫旺東至黃河之重重封鎖線所包圍，不時遭受軍事襲擊，先後佔去豫旺全縣、鎮原、寧縣、正寧、枸邑、淳化等五個縣城，及東西南北邊境大小村鎮數千處，共計土地面積三萬餘方公里。人口五十萬。

邊區現只人口一百四十八萬。面積九萬九千方公里。為行政實施便利計，劃為一市三十縣，五個分區。」

但是，『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會』編的『邊政叢書』之二，『陝甘寧邊區政府』二十八年至三十年的工作報告裏，對於『陝甘寧邊區』的所轄地，却記載得與羅邁的報告不同。

『陝甘寧邊區政府』二十八年至三十年的工作報告裏的第一篇解釋『陝甘寧邊區』的轄地時說：

『邊區轄地是由內戰時蘇維埃區演化而來。邊區各縣，有的沒有全縣都建立過蘇維埃，有的雖建立過却沒有鞏固，時進時退。……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與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先生在廬山談判，蔣承認蘇維埃區改陝甘寧邊區，為行政院直屬等於省的行政區域，劃定所屬陝甘寧三省即原屬蘇維埃區的二十三縣歸其管轄。旋經行政院會議通過』。

這裏所說的二十三縣，並沒有說明是否全是完整的縣份。至於這二十三縣內『沒有全縣都建立過蘇維埃』的地區，是否也歸『邊區』轄治？文中也不會加以解釋。

『陝甘寧邊區政府』的這份工作報告，是二十八年起，至三十年為止。在這一時期內的『邊區』所轄地，報告中明寫着：

『總計二十三縣，改爲二十七縣。人口一百三十五萬二千一百七十五人』。



如果拿這份報告和羅邁的報告作一個比較，我們可以看到『陝甘寧邊區』的轄地和人民，從開始到現在，不但沒有如羅氏所說的減少，並且相反的增多。土地增加了三個縣，人口則增加了十三萬多人。至於羅邁所說被『佔』的豫旺縣，在這份報告中，更從來不曾提到。報告裏所列舉的二十三縣的名稱，也沒有豫旺兩字。

『陝甘寧邊區』地圖的繪製，也與羅邁的報告有着同樣的作風的。陝西省宜川縣屬的秋林鎮，從有史以來便不曾建立過什麼『蘇維埃』，目前，事實上不但是不屬於『陝甘寧邊區』，並且是國立山西大學的所在地，可是在『陝甘寧邊區』的地圖裏，却將『秋林』兩字圍圈在『邊區界』內。黃龍山，在抗戰以前是距離陝北土共劉志丹高崗等的『游擊蘇區』相當遙遠的一個移民開墾區域，如今的『陝甘寧邊區』地圖，却從洛川宜君兩縣的附近分別突出兩條細而長的『邊區界』來，硬將黃龍山套上了一條頸練。因此，由中部到宜君，由宜君到同官的兩段公路，便平白無辜的被這條『邊區界』給腰斬去兩塊。每天，從洛川到同官的旅客們，當不下千百餘人，當他們在這條暢通無阻的平坦的公路上，眺望着古木撐

天的黃帝陵和雄峙兀立的金鎖關時，連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在中共眼光內看起來已經是兩入『邊區』。

秋林，是第二戰區和第八戰區的聯絡站；黃龍山，是一片宜農宜牧的良好墾植區。在軍事意義上和經濟價值上講，自然都是中共的垂涎區域。但是，這兩個地方以前和現在既然都不會屬於中共的範圍，為什麼中共要將它圈在『陝甘寧邊區』的『邊區界』內？這一點，我們根據中共已往的一貫宣傳攻勢看來，當不難見其用心之所在。至於羅邁的二十六縣被『佔』五縣一說，無非惡意宣傳，其結果則徒使稍悉中共內情者益信其言之無稽而已。

『陝甘寧邊區』的地域，在最近三年中既然有增無減，則人口的增加，也自然的和地域成爲正比。但是，『人』，是一個可以活動的東西，畢竟與土地有些不同。陝西省的土地被中共強佔以後，我們爲了團結抗戰的關係，便不得不委曲求全的任他佔去。而人口的交流，却雙方都不能禁止。每年，由『陝甘寧邊區』跑出來的人民，當然是數字很大，不過由陝西各縣跑進『陝甘寧邊區』的人民，實在也爲數不少。造成這種人口交流的因素，可以說，完全由於人民對於現實的



不滿和憎惡。

由『陝甘寧邊區』跑出來的人和由各縣跑進『陝甘寧邊區』的人，是有很  
大的區別的。

由『陝甘寧邊區』跑出來的人，大多數是文化人，學生，士兵。由陝西各縣  
跑進『陝甘寧邊區』的，則大多數是沒有智識的農民和壯丁。

陝西各縣和『陝甘寧邊區』人口的交流，爲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分別？大概  
的說，在中共是由於政治措施的不良所影響；在陝西各縣，則悉由人謀之不臧所  
使然。

第一：由於中共思想統制的嚴格，『陝甘寧邊區』的青年們，便喪失了自由  
接受一般教育的權利。由於中共箝制言論的徹底，『陝甘寧邊區』的文化人，便  
都成了毛澤東的應聲虫。他們受不住這『壓迫』，他們受不住這樣的寂寞，『跑』  
跑到祖國自由的地帶去，呼吸一點自由的空氣』，已經成了他們的一個最迫切的  
願望。但是，爲了中共防範的週密和我們陝西省當局對於逃出『陝甘寧邊區』人  
民的檢查，常常的使得他們失掉勇氣。在洛川，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團員們，

便曾經遇見過幾位從『陝甘寧邊區』逃出來求學的青年；在西安，便有着去年逃出來的一位抗大的副校長。中共的士兵，更是隨時都有逃進陝西各縣的，他們的逃走，大概是不堪忍受過分的勞動力的榨取和壓迫。

第二：從陝西各縣跑進『陝甘寧邊區』的農民，大多數是受了中共『豐衣足食』的宣傳，和受不了當地苛捐雜稅的剝削。這些苛捐雜稅，我們固然指不出具體的事實和名稱。不過僅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所過各縣的招待而論，所費也就不小。記者團的食和住，不用說，自然是新床新褥，海味山珍。就是記者團所經過的大街小巷，也無不灰牆黑戶，粉刷一新。單以郃陽一縣而論，記者團僅住宿一宵，食飯兩頓，開招待費已達十八萬元。這筆『交際費』在縣府的會計科目裏，想像中決對容納不下，而這筆經費的來源，既不會由縣長貼賠，則毫無疑問的就要落在民衆的頭上。記者團對於主人的盛情，雖然是不得不慚愧的收受，而對於這種以物表心的官僚政治作風和民衆們這筆意想不到的額外負擔，却二十四萬分的感到內疚和不安。在洛川和其他的小縣，記者團中便有不少人聽到過民衆們對於駐軍的不滿和對於各機關任意拘捕人民的怨言。由於我們這些縣級黨團政軍



幹部的不健全，再加上中共的誘惑，於是便造成了陝西各縣農民時常有人跑進『陝甘寧邊區』的惡果。

『陝甘寧邊區』的土地，三年來不斷的在擴大着；『陝甘寧邊區』人口，同樣的在不斷的增多。我們從羅邁的不符事實的宣傳和『陝甘寧邊區』毫無根據的地圖看來，可以見到中共的用心，決不只株守目前的二十六縣爲已足。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延安慶祝聯合國日時所提出的『保衛西北，保衛西安』的口號，雖然祇是一種宣傳攻勢，而其不甘寂寞的用心，也于此不難窺其趨向。我們爲了要防止惡流的泛濫，決不能僅靠着幾座碉堡的警戒，最澈底的方法，祇有加強我們和『陝甘寧邊區』交界處各縣的政治。

(一) 選派本黨有能力有熱忱肯於爲黨犧牲的同志到『陝甘寧邊區』鄰近的縣份去做專員縣長，授以隨時應變的特權，使其針對中共的措施和宣傳，在政治上加以澈底的改進。指定最有戰鬥實力的部隊和不貪污不怕死不干涉政治的軍官担任警戒線上的防禦工作。當地的黨團工作人員，更要以身做則領導民衆，啓迪民衆。如果處處能以人民的利益爲前題去做事，則中共的誘惑和宣傳，自可不攻

而破。

(二)鄰近『陝甘寧邊區』的行政費用，必須無條件的予以增加，使其努力生產運動，改善人民的生活。澈底消滅無業游民，務求耕者能有其田，工人有工可做。公立醫院，學校，均應普遍的加以設立，要做到一般的人民都有病可以醫，有書可以讀。比照中共的現行稅收，減輕人民的原有負擔。另一面，再加強宣傳工作，放寬『陝甘寧邊區』人民逃出後的檢查，則中共榨壓下的人民，自然會沛然來歸，莫之能禦。

陝西省第二區行政專員余正東，對於中共的認識，頗為清楚。余氏對於隣近『陝甘寧邊區』各縣長的或者久不視事，或者少來即去，或者勉強敷衍的現象，便曾向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內的幾位本黨同志表示遺憾，而深感到工作無法進展。這一現象的產生，不但說明本黨黨員的黨性之不夠堅強，並且更說明了陝西省政當局對於這些區域的忽視。一個有着特殊性質的縣份，是必須有着特殊能力的縣長才能應付的。這一點，我們實在不能不加以特別的注意。



# 中共的「黨」「黨員」和「黨的幹部」

中共真的是一個政黨嗎？如果單按照字面上說，也許我們不能否認中共是一個在野的政黨；可是，中共自己本身的想法呢？雖然它也是自稱爲在野黨而口口聲聲的在要求着『開放黨禁』，而它的行動方面，却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一件措施能夠合乎政黨的條件。

政黨和政黨之間的鬥爭，應該是以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和方法來作爲本錢，應該是以不違害目前國家民族前途的宣傳來做爲工具。但是，中共沒有這些，也根本不要這些，它有的只是割據的土地，俘虜的人民，不受國家法令的軍隊，一手包辦成功的政府。

所以，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講，我們祇能說中共是一個封建的割據者，而不能承認它是一個真正的政黨。

但是，中共爲什麼能夠存在呢？這雖然是在政府爲了抗日一切不得不委曲求

全的寬大政策下，而給了它一個機會；而本黨的黨員之冗雜鬆弛與幹部的官僚氣息，也實在是予人以可乘之機。『物必先腐而後虫生』，如果我們自己沒有一點缺陷，中共是沒有存在的因素的。

我們先不必問中共是否欺騙人民，壓迫羣衆，我們也不必管對於民衆有利的事件中共做了沒有做。首先，我們得要檢討一下我們自己的每一個幹部是否都能和總裁一樣的愛民如傷？每一件措施是否都已經遵照 總理的遺教在逐步推行？如果沒有，就得到加緊努力。因為中共做不做事和做的好做的壞，我們並沒有提醒它去做的義務，也沒有指示它做好的必要，而我們要是疏忽了一件事情不去做或是做而不好，那就馬上會被中共做爲進攻本黨的材料，而它的成長也就自在其中了。

中共之所以能夠生存成長的另一因素，就是它善于應付環境，善于利用機會。『進步』，是中共用以改正自己錯誤的遮羞工具。在最近的抗戰七年中，中共是的確有着很大的『進步』的。而中共的這種所謂的『進步』，便是建築在能夠『自知錯誤』上面，如果我們可以將本黨來和中共做一比較的話，我們可以說：



中共之所以能夠生存而且成長，完全是由於它的幹部健全，可以使上級明瞭自己『政策』的錯誤與實行方法的優劣，而加以不斷的改進。我們之所以生出腐肉，給中共以寄生的區域，完全是由於我們幹部的官僚習氣太深，而又官官相護，以致上級不能瞭解某一措施的真實情形所產生的惡果。

中共的組織嚴密，幹部健全與肯於苦幹，固然是它的一大優點，而這種優點的產生，也是具有着特殊的因素的：

(一)中共因為要想以武力奪取政權，其所做所為當然免不了隨時隨地的觸犯國家法令。所以，它的組織和機構，也就不不得不力求嚴密，以維持其現在的生

存。

(二)中共的所謂幹部，除了少數的幾個高級人員之外，大多數是沒有受過高深教育而僅僅由中共一手培養出來的工農份子。文化水準既低，智識也不太廣泛，在別的地方必定無法生存，自不得不永久的跟着毛澤東跑。

(三)中共的各級幹部，大多數是以前在各地從事所謂『地下活動』的人物，警覺性很高，對於紀律的遵守也特別嚴謹，同時，更因為各級之間也多是所謂

共過患難的『朋友』，當然也就不至于上下隔阂。

(四)中共現在雖然已經有了一點點的土地和人民，可是到現在却還是很小，絕不能供給它的軍政經費的需求，稍一不努力，馬上便有斷炊之虞，所以，環境的逼迫，使得它們不得不苦幹。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是可以應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的。中共由江西而陝北的時期，正是它『窮』已至于極端的階段；從進入陝北一直到現在為止，却正是它『窮』極而『變』的時代，假如我們不能忍着痛割去我們自己的腐肉，而使其失却寄生的所在，則單在道理上講，中共的由『變』而『通』，將來也未始沒有一點可能。

中共的黨員成份，是以工農份子為主體的，控制當然容易。也就是中共爲了要便于控制它的黨員，所以對於智識份子的入黨手續不但限制得特別的嚴，並且還要經過一個候補期。

中共的黨員入黨手續，據解放日報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刊載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裏面說：



「新黨員入黨時必須經過一定的介紹人。（依黨章和目前的規定是：工人，雇農一人介紹；小資產階級出身者二人介紹；脫離其他政黨而加入本黨者三人介紹）。由黨的小組和支部通過，經上級黨委的批准。參加過其他政治派別份子入黨，必須經過區黨委，中央分局或中央局的批准。」

「候補期的長短是根據新黨員的階級成分而定。目前黨中央暫定候補期間如下：工人雇農不要後補期，貧農與手工業工人一個月，革命學生，知識份子，小職員，中農，革命軍人三個月，其他成份六個月，但在特殊情形下得延長之。」

據作者附注裏說：關於候補黨員的期間之規定，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關於發展黨員的決議」。在「發展」黨員的決議裏，却加上了這樣的一個嚴格的「限制」，在一般人看起來，也許會有「這不是發展而是緊縮」的感覺；在中共本身的利益上講來，實在是有着莫大的必要的。中共之所以如此規定的藉口，雖然是說非工農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利益認識不夠，可是，它的真實的目的，却無非是爲了加強高級的領導權使得黨員便於控制而已。

中共黨員是有着不少應盡的義務的。這些義務的具體規定，不是中共黨人當然無法知道，單就原則上的規定而言，已經可以算得上極端的嚴厲了。中共規定的入黨資格與黨員的義務，歸納起來，約有五項：

(一) 中共規定的入黨資格，是堅決實行列寧的主張的。列寧的主張是：『凡承認黨綱，交納黨費及親身參加黨的組織之一者，均可成爲黨員』。而孟塞班克馬爾託夫所主張的『凡承認黨綱，交納黨費，並在黨的組織領導下經常贊助黨的人，均得成爲黨員』。則爲中共所反對。這就是說，中共對於黨員，不需要站在旁邊搖旗吶喊，而是要他們像作戰時的軍人一樣，能夠在指揮官的口令下，犧牲其個人的精神和身體的。

(二) 中共對於初入黨者，雖然並不要求其精通黨綱，但必須其承認黨綱，而有在入黨之後終身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精神。這裏所說爲『共產主義』而奮鬥，並不是說目前在中共的領導下做事即可，而是終身要在中共的領導下以實現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爲職志。也就是說，要一輩子爲中共以武力奪取政權的目標而努力。這一規定不但是在執行任務時需要如此，同時，還進一步的要他們表現



在日常生活行動中。

(三)『遵守黨的紀律和嚴守黨的祕密』，是中共黨員信條裏必須嚴格遵守的一項。也是中共『戰鬥力』之所以能夠保持的一個基本因素。中共的黨的組織，是等於一個特務工作機構的。所以，它需要每一個黨員『不要忘記許多年來由於忽視祕密工作而受到犧牲的血的經驗與教訓』，要每一個黨員『必須遵守祕密工作的紀律並且和一切忽視破壞黨的祕密工作的危險傾向作鬥爭』。它們的這種規定，不但是『任何黨內的不准對外公開的事件不能任意向黨外宣佈』，同時，就是『任何對其他黨員沒有必要說出的祕密事件』，也一律『不准在其他黨員中亂說』。

(四)『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黨員必須無條件的犧牲個人服從黨令，據劉少奇說，這是中共黨員的『最高原則』。百折不撓的執行黨所付予的任務，是中共每一個黨員必須做到的條件，這規定，不但是要黨員在『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可以毫不躊躇毫不勉強的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而且，要使黨員『以至於犧牲個人的生命』，還要『感覺愉快』。同時，中共雖然也說『黨也』

在可能條件下顧全與保障黨員個人不可缺少的利益」，「使黨員安心熱情的工作」。『分配適合他個性的工作』而『發揚他的長處』，但是，又規定『被分配的黨員不能以這一點做爲理由，來拒絕接受黨給他的工作』。這就是中共所謂的『黨性』。大公報認爲中共的增強『黨性』，不如增強『人性』，殊不知消滅『人性』，增強『黨性』，正是中共之所以能夠在我們腐肉上寄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辦黨的立場而言，也正應該使自己的每個黨員的『人性』都能與『黨性』相融合。中共的做法之可以指摘者，僅是它強制消滅它的每個黨員的『人性』而已。

（五）『做羣衆模範並向羣衆學習』。是中共規定的黨員信條中最好的一項。中共六中全會的口號，便有着『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的規定。毛澤東所作的『農村調查序言二』裏談到學習的態度說：『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同時，說到學習的對象，他指出他在湖南做『農村調查』工作時的『先生』，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了的老秀才，一個破了產的商會長，一個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



吏。」毛澤東的這些「學習」對象，雖然說的話也許不免過火，但是，從他們口中來了解一點真實的社會黑暗情形，却可以說是比較的可靠。至於學習軍事技術及毛澤東的理論，在中共「黨員軍事化」與「提高黨員文化水準」的口號下，更是各黨員的必修課程。在「做羣衆模範」上，中共是要它的黨員在黨的立場上，做「民衆的朋友」，而不要做「民衆的上司」。要它的每個黨員「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這一點，中共的黨員多數是做到了的。

中共黨員應盡的義務既是如此之多而且嚴，而所享的權利又是小得可以說是等於沒有，那末，爲什麼還是有人參加呢？主要的原因，大概都是由於不滿現實所造成。中共組織部長劉少奇便承認「很多的黨員固然是爲了要實現共產主義爲了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偉大目的而來加入共產黨的，但還有另外一些黨員還是爲了其他原因與目的而入黨」，這些人物大概都是很容易爭取的，祇是由於中共組織的嚴密，使他們失足之後不敢自拔，也有些是由於中共教育訓練的成功，而漸漸的使他們變成頑固。如果我們能早日完成三民主義的一切建設，以消除一般人對於現實的不滿，而減少其走入歧途的因素，另一方面再以懷柔方式來爭

取失足的中共黨員，則中共僅憑着現在的特工式的高壓與烏托邦式的引誘是決不能與我們抗衡的。

中共每一個黨員的介紹人，對於被介紹的新黨員，是終身有着責任的。「他不僅需要精細的留意被介紹者的行動與言論的表現，而且特別應該經常在政治上工作上積極的耐心的幫助他教育他，而黨也可以此作為測驗該黨員對黨負責忠實于黨的標準之一」。中共用這種等于連鎖的方法來控制黨員教育黨員。實際上實在是收了不少的效果。

中共的幹部是從黨員裏產生出來的，當然是毫無疑問的要遵守着一切黨員的信條和規定。其所以與一般黨員不同的地方，僅是在工作上他要較黨員更多負一點實際責任；而黨對於他的生活保障，在他自己不會死上級也沒有命令他死以前，也比較對一般黨員更要多給他一點便利而已。所以，中共的黨員是可以有自己的職業的，而中共的幹部則必須要為黨服務。

中共對於幹部的教育，是極端的重視的。中共訓練黨員，僅是在小組會上或工作上給予以集體的和個別的訓練。對於幹部，則有着專門為幹部而設的學校在



所謂『陝甘寧邊區政府』二十八年至卅年的工作報告裏，幹部教育的經費便是僅次于軍事經費而被列在第二位的。在幹部教育之中，中共中央並於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規定應以在職幹部教育放在第一位。

中共的幹部教育約有三點可以說是成功的，中共幹部的工作，大概說來也有三點可以注意。而兩者之間却又有着一個共同的因素，這因素便是注重實際不問其他。

### 中共的幹部教育注重三點：

第一：注重業務教育。無論是直屬於中共中央的『黨校』，或是直屬於中共軍事委員會的『抗大』，對於學員的訓練，多半採取小組討論方式，讓大家儘量在業務的困難方面提出問題，再舉行討論克服的方法。使大家有一交換意見的機會與習慣。直屬於所謂『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延安』，雖然不是訓練中共幹部而是訓練應用人員的所在，而教育方法也完全相同。

第二：注重政治教育：中共以前對於幹部的政治教育，完全是喂以馬列主義，現在則一切政治教育的出發點，必須以毛澤東所提的『根據歷史』為皈依。使

得幹部能從本國目前環境中認識共產主義的理論。在本國的目前環境裏，活用共產主義的學說。

第三：注重在職教育：中共每一機構的在職幹部，每天必須以兩小時來做爲學習的時間，這兩小時是算在工作時間之內的。各級機構的領導人員，應該是當然的教官，學習的成績，也要列在工作考核之內。這樣，上下級的意見，自然是要比較交流的多，而工作的效率，當然也可能因之而增進。

中共幹部工作的特點，也有三點：

第一：深入各個階層。中共各級黨的組織裏面的負責人，工作上的規定不是完全做黨務工作的。上級並且規定着各級黨的組織機構裏的幹部，必須要參加到各人駐在地的軍政機關和民衆團體裏去，使得黨的決議，能夠透過幹部在軍政機關和民衆團體裏發生積極的作用，而順利的達成其目的。

第二：工作第一。中共的幹部，雖然有着高級中級下級的區別，待遇上也有着不同，但是，只要爲了工作的需要，一個『中委』，或者可能被派去做馬伕，不過他在黨裏的地位和待遇，並不因此受到影響。同時，爲了中共在目前的困難



情形下，根本便談不上享受，所以各級待遇雖有着并不太多的差別，而內部之間的利害衝突，却也不大多見。

第三：分工合作的精密。中共因為經常要做所謂的『地下活動』，所以對於幹部職務的指派，與能力的高低，多數是成爲正比。劉少奇說：『任何黨員，任何領袖與英雄，他在共產主義事業中，只能做一部份的工作，共產主義事業是一個無數千萬人長期集體創作的事業，任何人也不能包辦。』所以中共對於幹部的分工，是頗爲精細的。祇要他按照他的能力或特長去做適合于他本身的一部份工作。『包辦』當然是不可能。就是個人風頭主義或是標新立異也全都在絕對禁止之列。

中共的這些措施，在『整風運動』以後，是的確的一件件都有了進步的。毛澤東的『反對黨八股』，當真是發生了不少的作用。以前的中共可以說是土匪時代，祇知道爲所欲爲；現在，則已經進步到偷人之長補己之短的時期。雖然，我們知道共產主義之終不能適用於我國，可是，在中共竊據三民主義的旗幟以欺騙人民的現況下，我們對於中共趁着我們全力抗戰無暇他顧期間來多竊取一點土地

，多吸收一些黨員以爲其日後以武力奪取政權的準備，也絕不能過分的忽視。中共的『黨政軍民領導一元化』，也許有很多人以爲是由黨來領導政軍民；而實際上，祇是毛澤東領導黨，黨領導了政和軍，軍政工作者又在黨的原則下來領導民衆。同時，黨再從側面的去指導民衆，使民衆接受軍政當局的領導。如果以次序來排列的話，則毛澤東是第一位，黨是第二位。政和軍是第三位，而政略大衆於軍，在這種情況下，民便不得不居於第四位了。而并不是黨居第一位，政軍民居於第二位的。

再實際一點講：中共的『黨政軍民領導一元化』，可以說是：有槍的智識份子，一面指揮着無槍的智識份子去煽動誘惑既無槍又無智識的工農大衆，一面却高捧起既無槍又無智識的工農份子，要無槍而有智識的份子來向他們『學習』。如果一個黨可以比做一部機器的話，則黨的領袖應該是一位總工程師，高級幹部則是各部門的原動力。各個黨員必須是一個個的堅強的齒輪，而下級幹部就一定要擔負起如同聯繫各個齒輪任務的軸承。中共的總工程師的能力既然不見得高明，原動力也不見得有多大；齒輪既不夠堅強，軸承也不夠尺寸，其所以能夠



走動的原因，不過祇是每一零件都能盡到職責。我們雖然有着頂好的總工程師，也有着很大的原動力和堅強而衆多的齒輪，但是，僅僅爲了軸承沒有發生聯繫作用，以至所有的齒輪全不能在總工程師的領導下跟着原動力而轉動。這真是我們中下級幹部們不可否認的一件恥辱。

爲了拯救我們的國家，爲了拯救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中下級幹部們必須要挺起腰來，穿入每一個齒輪的核心而使其互相扣緊，俾能在偉大的總工程師的領導下，跟着原動力急轉起來，然後才能使害多於利而發生副作用的機器遭受自然淘汰，而以我們的力量供獻於社會人羣，供獻於整個的世界。

延安歸來

三一

## 中共的『民主』政治

中共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一天到晚在要求『民主』，中共割據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也是無一不以『民主』二字來標榜召號的。但是，中共的『民主』，到底『民主』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呢？在技巧上說，中共是有着它的特長的。

據『陝甘寧邊區建設簡述』裏說：『邊區民主制度是由下而上，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人民大眾的民主集中制。……：邊區司法機關，亦在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行使其職務，所以邊區政制是立法，司法，行政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又說：『我們的口號是一切爲人民又倚靠人民，我們的方法是從人民從實際中集中起來，又回到人民與實際中去。』

這一段文章，是頗爲值得玩味的。中共的『民主』作風，單在表面上看，倒的確似乎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但是，我們應該知道：『陝甘寧邊區』，僅是一個農村社會，一般農民的智



識水準，當然比不上中共的黨員。毛澤東的辯證法，更是左右民衆的一件有力的武器。所以，事實上中共「民主」政治的「少數服從多數」，並不是少數共產黨黨員服從多數民衆，所謂的「由下而上」，也不是民間的意見可以被「政府」採納。這僅是透過中共的宣傳技術，使得一般人民不自知其被愚而已。

這種形式上的「自下而上」和表面上的「少數服從多數」，做法是怎樣呢？舉例來說：中共爲了要增加稅收，擴充實力，不得不榨壓人民的勞力，發起「生產運動」。於是中共便借着「一切爲了抗日，一切爲了人民」的金字招牌，由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緊接着中共的黨員利用人民企求提高生活水準的本能和羣衆敵愾同仇的情緒，將毛澤東的號召來加以渲染、使得非努力生產不可的意識深入民間，以爲榨取人民勞力的屏障。然後，再由各縣區鄉村的中共黨員，發動人民自己討論促進「生產運動」的辦法。等到各地民衆自己商討訂定的辦法彙齊，中共便擇其最與自己有利的一條，拿來約束人民，訂成金科玉律。因爲辦法由於人民自己訂擬，實行起來，當然也就便利；縱然遇有困難發生，中共也可以不負任何責任。所以，在一般民衆看來，中共的這種作法，

確有些近乎「民主」，而事實上却已經被「上」級和「少數」所愚弄而不自知。

中共「民主」政治作風的特點，便是憑仗着黨的力量，讓黨員將上級所決定的「原則」，配合地方情形，透入民間，引起同情的響應，然後，再由黨員的發動，讓民衆自己在這個「原則」之下訂出「辦法」來作繭自縛。這種「原則自上而下」和「辦法自下而上」的作法，實在為中共對於爭取民衆方面的一大進步。

「陝甘寧邊區」既然也有着二百多萬人口，自然的也分着若干階層。大概的說，可以分爲智識份子，地主和農民三大類。中共爲着要標榜自己的「民主」作風，便將這三大階層的人物分作三種方式來加以管理。「參議會」，是容納智識份子的大本營，利用智識份子的總樞紐。「勞動英雄」和「二流子」，便是組織農民驅使農民最好的武器。地主和士紳，則都收容在「縣」「鄉」「邊區」各級「政府」裏，讓他們在「黨」的領導下演傀儡劇玩。同時，中共並在三大階層的人物和機構裏，插進大批的「黨員」，以爲策動某一設施的原動力。這樣，中共所標榜的「民主」政治，便在「陝甘寧邊區」裏鑼鼓喧天的上演起來。

現在，我們再分別的看一看「陝甘寧邊區」裏所要的把戲，究竟是內幕如何



第一：「陝甘寧邊區」的各級參議會的選舉：

「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是中共所標榜的「民意機構」，「邊區政府」的「委員」與「正副主席」都要在「邊區」的「參議員」中選舉。「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民國三十年五月一日所提出的「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第五條，便明訂着：

「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羣衆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爲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爲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

這裏所謂的「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的條文，便是中共所標榜的民主——也就是中共所謂的「三三制」。但是，實際上的情形是怎樣呢？「陝甘寧邊區政府祕書長」羅邁，「邊區參議會議長」高崗，「副議長」謝覺

說，在招待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招待會上，都分別的承認『邊區參議會職員中，共產黨人仍超過三分之一』。『政府機關的一般職員中，共產黨人尚佔多數。』這種不能『民主』不能實行『三三制』的原因，羅邁的解釋是『在於戰爭環境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條件』的限制所使然。

中共的黨員既然在『陝甘寧邊區』的『民意機關』和『政府機關』裏都佔多數，則中共的『政策』，自然是絕無問題的可以全部通過實施。但是，各縣各鄉的下級『參議會』裏的『議員』，是要從土著居民中來選舉的，中共的黨員自然不能全佔半數。所以，在民國三十二年的四月二十五日，中共又頒佈了一個『陝甘寧邊區政紀總則草案』。一方面，在第一條裏規定『各級參議會為各級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各級政府服從各該級參議會之決議』。同時，又在第二條裏限制着『下級參議會無權改變否決或停止上級參議會或上級政府之決議法令與命令，上級政府對下級參議會之決議，認為不適當時，有權停止其執行或糾正之。』

這便是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內，施行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與『民主』。



中共在『陝甘寧邊區』裏所辦的『選舉』，是有着一個特點的，這特點。便是一切爲了『黨』的利益，一切爲了『黨』的本身打算。所以，『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的候選人，各『黨』『派』及各『團體』都有着推薦權的。事實上在『陝甘寧邊區』裏並找不出其他的『黨』『派』，結果，當然是中共的黨員佔着多數。至於中共所說的『無黨無派』的人物，也大多數平時便是中共的外圍，如『左翼文化人』蕭軍，艾青等等，一旦被『選』爲『參議員』，自然是死心塌地的而爲中共服務了。甚至於當地的駐軍和現在居留於『陝甘寧邊區』的日本共產黨員，荷蘭印度的共產黨員，如森健，阿里阿紅，巴蘇華等，也都被『陝甘寧邊區政府』聘爲『參議員』。高崗和謝覺哉對於外籍人士被聘爲『邊區』『參議員』的解釋是：『只要是反法西斯的人士而肯爲中國的抗戰工作的，中共當不外國籍，一并歡迎。』這就是說：『不論是那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員。只要是來爲中共幫忙的，都可以得到一個『參議員』的名義，而使得他能夠實際的有權力爲中共作事。』

在『陝甘寧邊區』的第二屆『參議會』的『參議員』二百九十一人中，可以

說，沒有一個人不是在中共的領導下發生積極作用的。中共在『陝甘寧邊區』所辦的『選舉』的另一特點，便是絕對的不敷衍任何人。如果有一個人決心抗日而不肯爲中共所利用，縱然有着最高的能力，中共也一定想出種種的罪名，使用黨員去鼓動羣衆予以打擊。如果有一個廢人而肯聽中共的指揮，就是一無所長的一塊渣滓，中共也一定運用黨員去同羣衆宣傳鼓吹，使其能夠建立信仰，發生力量。

第二：中共對於民衆的組織工作：

中共因有鑒於過去的『政策』有如傷寒病菌，在任何地方只要使用了一次，便永遠不能再發，所以，當毛澤東由江西竄進陝北以後，首先便放棄了過去殺人越貨的勾當，而提出『爭取羣衆』『聯繫羣衆』的口號。因此，中共現在『陝甘寧邊區』對於民衆的組織工作，也和在它江西的時期變得迥然不同。

中共爲了要想在抗戰期間擴充實力，故一切設施，不得不以『發展經濟』爲皈依。而發展經濟的主要條件，便是要靠人民生產的努力。所以，中共現在『陝甘寧邊區』的民衆組訓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農民供獻出過分的努力來從事



耕作，藉以增加其農業稅收。在這樣的一個『目標』下，中共組訓民衆的『原則』是『找典型』，『辦法』則是變相的強迫人民組織變工札工等隊。

在『陝甘寧邊區』的典型人物；可以分爲兩種：一種好的典型人物稱爲『勞動英雄』，一種壞的典型人物稱爲『二流子』。『勞動英雄』是到處受人尊重的，如現在的吳滿有，趙占魁等，他們可以出席『參議會』或『一攬子』會，他們也可以隨便進出於中共的機關，和毛澤東林伯渠直接的對坐談天。『二流子』則到處遭受白眼，如果有人門上被釘上了一塊『二流子』的木牌，那就簡直是已經被擯於社會人羣之外，再也休想生存立足。

中共利用着『抗日必須努力生產』的招牌，到處去找這兩種典型人物，遇有肯於賣力的農民，便命令黨員發動羣衆選他爲『勞動英雄』，而給予以特殊的光榮和便利。使其由貧農變成中農，由中農變成地主。遇有不肯過分供獻勞力者，則給予以『二流子』的頭銜，使之不能生存，或是不得不俯首就範的拿起鋤頭去開荒種地。至於介乎兩者之間的一般農民，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不敢不羣以『勞動英雄』爲模範，而一任中共的權壓。於是，中共便利用『勞動英雄』的號召，

分別將各地的壯丁組成變工工運運輸隊，美其名曰「人民自動的勞動互助」，而實際上則是變相的將人民加以組織；并榨取其體中過分勞力。同時，這些變工工運運輸隊隊員內的及齡壯丁，便都成了「陝甘寧邊區」的「人民自衛軍」的基礎，「人民自衛軍」分爲兩級，第一級是這些壯丁中選出的「普通自衛軍」，任務是後方勤務；第二級便是「普通自衛軍」中選出的「基幹自衛軍」，「基幹自衛軍」便是中共軍的補充隊伍。任務是配合中共軍正式作戰。

中共現在的民衆組訓工作的特點，是一切都透過所謂的「民族形式」，而不再照着蘇聯的原書翻版。中共要號召人民「組織起來」，便提出「提高生產效率，爭取豐衣足食」的口號來激動人民求取美滿生活的慾望，中共要想人民參加軍隊擴張自己的實力，便提出「團結抗日」「保衛邊區」的口號來啓迪人民敵愾同仇的情緒。因此，現在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組訓民衆的效果，確實是遠較在江西時代的強迫方式爲佳。同時，「陝甘寧邊區」人民的生活，因努力生產而比以前提高，却也是一件不容諱言的事實。

第三；中共對於封建勢力和封建思想的運用：



中共由江西流竄到陝北以後，因為本身力量的腦弱，不得不遷就陝北的土共高崗劉志丹等來休養喘息，抗戰開始，中共更爲着要想趁戰時立定脚跟，打穩基礎，更不得利用當地的封建勢力以爭取人心。高崗之所以被派爲「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書記』，或者可以說是由於『同志』的關係，而綏德大地主李鼎銘之担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則十足地說明了中共對於封建勢力的爭取和運用。

李鼎銘之被選爲『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一具傀儡，中共對於李鼎銘的運用，事實上是異常成功的。而李鼎銘在受了中共的騙策以後，也的確的爲中共做了不少的事情。

中共之利用李鼎銘，其最初的用意，大概不外乎想藉李來標榜『民主』，或藉李來說明其對於過去『土地政策』的轉變。李鼎銘以一個『應該』被共產黨夷其九族的『劣紳』，而竟被中共垂青，一躍而爲『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李氏本人自然是感激萬分而不得不傾其全力。在中共找到這樣一個『陝北』人來治『陝北』事，一切的措施，當然也就切合風俗民情，無往而不順利。

李鼎銘沐猴而冠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向中共提出了「簡政」的建議。當時，中共因為到達「陝北」以後，極力擴充實力的結果，已經深感到力量的大而不實，正在積極「整風」；所以，李鼎銘的這一建議，竟大大的受到了毛澤東的贊賞而加以實施。「簡政」的結果，據李鼎銘在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七日「邊區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席上報告說：

「我們做到了業務精簡。實行生產第一，而在其中則以農業為第一位；實行教育第二。而在其中則以幹部教育放在第一位。結果：農業生產運動的普遍展開，……幹部整風教育的日益深入，……過去「以上代下」的工作方式已基本克服……下級幹部的積極性也大大提高了。

我們也做到了機構精簡，各廳處院的內部機構已經裁併了四分之一，如取消各廳院祕書室……民廳由四科合併為二科，各系統緝私機關與保安處合併。既避免了頭重腳輕的積弊，又達成了政簡民便的目的。

我們又調整了幹部，提拔了一部份幹部到專署和邊府工作，例如邊府就調了五個縣長來擔任處長科長等職，……也選派了許多得力幹部降級使用，



加強了下級。……此外，我們還調送了一百五十多個高中級幹部去學校學習，以便更好的培養與提高他們，又調送了一批思想政治不夠健全的幹部去學校整風……這些措施，說明了我們的精簡上級加強下級……的方針，基本上已經實現。」

「簡政」結果被編餘的人員怎樣處置呢？據李鼎銘說，大概分爲三類：（一）轉入生產。（二）轉送學校。（三）加強下級。

李鼎銘的這個報告，我們很可以信以爲真。「陝甘寧邊區」的民衆對於中共的痛惡情緒，遠較江西民衆爲低，便可以說明中共之運用封建勢力的成功與李鼎銘在中共的利用下所發生的力量。

中共對於封建思想的運用，也是有着相當的成功。「陝甘寧邊區」地帶，過去經常苦旱，中共到達「陝北」以後，最近幾年來，的確是連歲豐收。中共爲了要取得一般人民的信仰，硬說是天時的變化是由於他們帶來。民間便因此而流行着兩個小故事：一個說是：「澤」者「水」也，「陝北」的雨水充足，實在是應該歸功於毛「澤」東帶了「水」來。另一個說是：「賀龍」者，「活龍」也。

賀龍駐防在『陝甘寧邊區』，所以天才不早。這種妖言惑衆的舉動，本來是幼稚得可憐可笑，可是，中共的『黨』徒們配合着地方風俗民情來加以利用，其效果倒遠較教育爲高。至於小學教科書內的『太陽出來一點紅，東方出了個毛澤東。』的課文；竟儼然以毛澤東比做帝王，其封建意識之濃厚，更是可驚而又可鄙。

中共現在對於地方的封建勢力，在自己新的力量尙未成長以前，決不去加以絲毫的干犯，如有能夠利用之處，更必千方百計的取來加以利用。這種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其優點，是暫時的取得了安定。其弱點，是地方上的封建勢力日漸增長而無法抑制。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的居留期內，毛澤東朱德等均曾數宴記者團，每次的宴客中都有着高崗的席位，而高崗却一次都不曾出席。這一點，雖不能主觀的斷定『客共』『土共』之間有了間隙，但是，至少可以看出這裏面決不會絲毫沒有問題。最低的限度，也可以看出高崗對於毛澤東朱德的禮敬程度，遠不如中共的一般原有幹部之甚。

現在，我們綜結起來說：

中共的『民主』制度是口頭爲了人民實際爲了自己，使用少數『黨』員愚弄



多數以衆；利用少數的典型人物壓迫多數的工農份子；在一切爲了『黨』的利益  
的『原則』下，立法，司法，行政都受了『黨』的統制而行使其『職權』。所以  
，『陝甘寧邊區』所實施的『民主』，便是透過『民主』形式的毛澤東個人的獨  
裁。『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便等於封建式的君主的集權。

## 中共的練兵養兵帶兵與用兵

中共的軍事實力，我們是不應該過分忽視的。對於中共軍事力量所能造成的惡果，我們與其估計得過低，以至於疏忽防範，倒不如將它估計得較高一點，以提高我們警覺和戒備。我們應該知道中共之所以能夠存在到今天，並不是爲了它也有着一個主義，也不單是爲了它有着一個組織嚴密的黨，在它之所以能夠存在到今天的因素裏，它的軍隊，是佔着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的。如果說，中共是寄生在我們的腐肉上的，那末，中共的黨則僅僅是細菌的核心，而中共的軍，便可以說是保衛這些細菌抵抗實力的外衣了。

中共是『以黨治軍』的，黨所派在各級部隊裏的政治委員在軍隊中有着與各級部隊長官同樣甚至超過的權力，任何一件事情，無論是士兵教育或是作戰命令，都要經過政治委員的副署。各級政治委員，也要負責的與士兵官佐發生密切的聯繫，而對各該級的部隊施以精神教育。也就是說，要使每個政治委員教會每個



士兵怎樣去做一個毛澤東的忠實信徒，而聽其驅策。這一點，中共做的是非常成功的。朱德在三十二年七月四日的中國記者招待會中，便會說：『我們的軍隊，現在已經做到堅決服從黨的命令的地步，而可以不以各個部隊長官來統率軍隊。祇要是事實上有所必要，各個部隊長官可以隨便互調而絕不至於影響到戰鬥力量。』這話的可靠性雖不能說十二分的正確，可是中共除了毛澤東以外，對於各單位主管人員的發生單獨的偶像領導做用，確實是禁止得極端嚴厲的。在過去，固然中共內部也有着不同的『路線問題』，而在同一時期裏面，則絕不會容許有兩條『路線』同時存在或平均發展。如張國燾之流的人物，都是在毛澤東的打擊下才不得不一一出走。

中共的軍事教育可以分做作戰教育和精神教育兩部，這兩部的教育，都是有着各自的特徵的，這裏所說的特徵，事實上只是一種偏向，但是，在中共目前的情況下，這種偏向對它自己是有利而無害的，也可以說，這就是中共在軍事上能夠暫存的一種成功。

作戰教育方面的特徵，是注意應用技術的訓練：中共訓練士兵，是根據毛澤

東的所謂『游擊戰術』偏向於應用技術的；所以，中共軍的基本操練，也就差得太遠。中共軍的應用技術，大概的說，可以分爲兩項，第一是『跑得快』，第二是『打得準』。如果單拿這種沒有受過基本訓練的隊伍來和敵人作戰，事實上當然是百分之百的不可能。就是朱德自己，也承認中共的『慣於游擊戰的部隊要改爲正規軍，至少要再加上半年到一年的訓練』。但是，在中共『敵來我退，敵退我進』的流寇式的『游擊戰』中，其可能發生的效果，倒也還相當的大。

據中共三五九旅旅長王震說：中共的軍隊，『能夠在一分鐘內，越過三個不同的障礙，擲出三個手榴彈，殺傷五個假想敵』。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共警備司令部一隊士兵的表演，大概有五分之四可以完全做到這個標準。擲手榴彈，是中共軍的唯一拿手好戲，因爲中共的軍火製造廠內產量最多的武器便是手榴彈，所以中共軍對於手榴彈的訓練也就特別的加以充分利用。炸碉堡，炸火車頭，炸汽車，炸營舍，炸戰壕，中共軍對於用手榴彈來炸這些東西的方法，也都有着相當的研究。

『跑得快』是中共軍的傳統優點，當然可以說毫無疑問；『打得準』一項，



僅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金盆灣所看見的二五九旅迫擊砲實彈射擊而論，成績還算不壞。其他槍枝的射擊雖然不能證明其『準』的程度如何，但是，在中共目前子彈製造困難的狀態下，使得每一個士兵都不能隨意的浪費子彈，是很可能做得很好，而且也是中共必須要做得很好的。

精神教育方面的特徵，是以仇恨與事實訓練士兵：中共對於士兵的訓練，完全是假手事實來培養其仇恨心理的。譬如，中共要榨取士兵勞力，使他們自己解決生活問題，毛澤東就教他的幹部告訴士兵說：『你們今天辛苦耕地的原因，便是國民黨不給八路軍發餉。』中共要士兵去襲擊友軍，毛澤東就叫他的幹部告訴士兵說：『國民黨又要像在江西的時候一樣來圍剿我們了，爲了保護你們幾年來努力建立的邊區，使你們比現在的生活更好一點活下去，你們祇有去同敵人拚命。』同時，我們的國軍中如果有某一部份內偶而發現了不良的措施或是不良的現象，馬上就會被中共利用爲教育士兵的最好材料，而使得他們的士兵對於國軍的長官簡直看成毒蛇猛獸，以至於雖然對於中共的措施也感到不滿，却沒有逃出去的勇氣。尤其是軍隊中的一般中下級幹部，仇恨心理特別的強，一提起過大草

地吃皮鞋來，無不髮指眦裂。這正是中共仇恨教育成功，也就是中共軍隊能夠維繫不散的因素。

中共的軍士精神教育的另一特點，便是一面用士兵自己的勞力來安定他的生活，而使得每一個士兵對於自己辛勞所換得的收穫，都有着一種深厚的喜悅和留戀。另一面更使得軍民之間在『生產』上發生聯繫，並且稱呼士兵爲『人民的兒子』，以培養民衆對於軍隊的情感，這一點，中共也做得不壞。不過我們要是從另一個觀點上看，也可以說是陝北的人民太窮了，其他各地如敵後的人民也同樣是維持不了生活，中共在陝的駐軍想擾民也無物可擾；而中共在敵後的『游擊戰』，又隨時隨地的需要着人民的協助，想擾民也決不敢擾。由於這兩樣因素做爲基礎，所以中共軍與民衆的情感才能維繫不變。

中共的軍風紀，是注重實際的執行任務時的絕對服從，而並不注意平時的禮貌的。一個士兵可以隨便的銜着烟捲和一個直接的長官撩天，可是對於民衆，却必須恭而且敬。

中共爲着物資糧食的不足，一般的部隊在可能的情況下，原則是不許脫離『



生產』的。所以，凡是駐在稍爲安定一點的地區時，便要從事於開荒工作。這可以說是中共的『寓兵於農』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共爲了要使士兵的補充不至於發生困難起見，特將各地的農民用着『勞動互助』『增加生產』的美名『組織起來』，從中挑出壯丁編成普通自衛軍和基幹自衛軍，以爲『正規軍』的補充部隊。如果按照『寓兵於農』的說法反過來講，中共的這一措施、大概可以叫做『寓農於兵』了，中共這兩種做法所收到的效果，都是非常可觀的。

部隊士兵的『生產』工作，做得最好的是中共的三五九旅，這一旅人，大概是毛澤東的『警衛軍』，所以駐在延安四年多而沒有調過一次防。旅長王震，是一個十足的頑固份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裏的中央日報張文伯和作者，都會被他指爲『特務份子』。他一身兼任着『三五九旅旅長』，『延安衛戍司令』，『延屬分區警備司令』三個要職，他主要的工作便是保衛毛澤東，與部隊的『生產示範』。他這一旅人，因爲很久沒有作戰，所以全副精力都放在『生產』上，四年多開荒的結果，據說是除了自給自足以外，今（三十三）年還可以繳出一萬担『公糧』。同時，士兵們由於自己雙手磨成血泡，過分的勞力所換得的代價，三

餐小米飯可以儘量的吃飽，實際上倒真的可以說是還不成問題。

中共『寓農於兵』的『政策』，收到的效果也相當的大，據羅邁的報告：所謂『陝甘寧邊區』的壯丁，到三十三年初春爲止，已經組織爲普通自衛軍的總數，是十四萬五千三百五十人，由普通自衛軍中抽出來的基幹自衛軍，也已有兩萬一千八百零三名，如果這個數字可靠的話，以僅有一百四十幾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裏，竟能抽出十分之一的壯丁，成績應該是說相當的良好的。同時，中共用這種方式來『徵兵』，可能有兩種利益。第一：因爲我國的農民佔着整個人口的最大的多數，壯丁的來源，當然也就多偏向於農村。中共借『勞動互助』爲名而將所有的農民都組織成『變工』『扎工』『運輸』等隊，則農民裏的壯丁數目，自然也就一目了然而無從逃避。第二：因爲基幹自衛軍的組織不是普通平均的抽調，而是挑選壯丁中最精強的青年，所以補充到『正規軍』裏去，身體的強壯和接受訓練的程度都不至相差太遠。中共對於這些農民出身而由它自己一手訓練成功的士兵，是極爲珍惜重視的，而對於俘虜來的偽軍等，則比較上看待得差。



中共軍的人數究竟有多少，作戰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呢？據朱德說：中共現有『正規軍游擊隊四十七萬人，民兵二百萬。』據葉劍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對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說：『祇要統帥部的反攻命令一到，中共軍『可以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漢等地，立時懸上我們的國旗。』同時，葉劍英又說：『中共軍現在抗擊的敵人佔敵人在華軍總數百分之六十四點五，而國民黨的軍隊僅抗擊在華敵軍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五。』而毛澤東却在五月二十四日對『延安』的學生說：『中共軍所抗擊的敵人，約佔敵在華部隊的總數百分之五十八。』這一矛盾，我們並沒有注意的價值，我們可以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中共爲什麼要如此說，其所以如此說的原因，究竟有無根據？

(一) 朱德所說的『正規軍游擊隊四十七萬』的數字，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誇大其詞，帶有宣傳其實力強大的作用。另一種可能是不止此數，而他故意少說、以疏忽我們的戒備。『民兵二百萬』，倒是並不假。不過這些民兵並不是屬於中共的，而祇是敵後民衆自動組織起來的抗日武裝。爲什麼中共敢於將這些民兵劃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以內呢？這原因，便是由於我們沒有將這些民兵真實的

領導起來，而實際上是由於中共和他們保持着聯繫的。據淪陷區逃出來的人說，敵後民衆的抗日情緒是極高的。在他們的內心裏，總以為中共究竟比汪精衛好些，在沒有方法接受我們的領導以前來和中共聯繫一下，也總比沒有援助爲佳。但是，中共的『游擊戰』，却使他們非常的失望。因爲中共在抵抗不了敵人時，常常的要帶着民兵逃命，以至於當地的民衆也常常有逃不了而被敵人抓去。『幾時蔣委員長的兵一到，咱們便可以安居樂業而不要跑了。』敵後的人民，差不多每人都有着這樣的一種深切的懷念。所以，祇要我們派人到敵後去，這些民兵應該是屬於我們而不屬於中共的。

(二)葉劍英的兩篇話，不管其折扣多大，而我們都應該承認其可能性的存在。第一；中共所謂的『地下活動』，事實上是不可否認的到處都存在着，將來，在國軍反攻到天津、北平、上海、南京、武漢城郊的時候，中共的所謂『地下部隊』，便很可能趁着我們國軍和敵人全力搏鬥的期間，而實施其偷竊據的技術來攫取城池。讓我們出力而它却坐享其成。如果我們的軍隊在完全打退敵人以後，再來進城佈防，中共便一定會用着它一貫的喊冤式的宣傳，來攻擊我們又要



對他『圍剿』了。

葉劍英曾經贈給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幅中共軍分佈情況的大地圖，其中所畫的所謂『中共敵後抗日根據地』，幾乎敵人到處，全都有中共軍的存在。真實的情況固不盡如此，可是中共的敵後軍事佈置，是有着很深的用心的。雖然，它在敵後的兵員並不算怎樣多，而分佈則相當的週密。凡是淪陷區大都市的郊外敵人兵力顧及不到的所在，它都有很少的兵員佔着一個小小的據點。這些據點雖小，而每個據點一聯繫起來，馬上便可以變為一條長線的。在總反攻開始的時候，這一點，我們實在不能不深切的注意。

(三) 葉劍英說中共軍『抗擊』在華敵軍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點五，而毛澤東却說僅有百分之五十八；不論到底是誰正確。還是兩個都不正確，而中共的用心，無非等於一說：『國民黨抗擊的敵軍沒有中共抗擊的敵軍多』。中共為什麼這樣說，其用意大概祇是爲了宣傳它敵後的『實力』同它的抗戰的『功勳』，中共真的『抗擊』在華敵軍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點五或是百分之五十八嗎？可以說，敵軍的數目倒不假，不過並不是中共軍所『抗擊』的，而是一個中共軍和幾個

敵軍遙遙的觀望着。再進一步說，在華敵軍有總數的不到百分之五十是日夜和我們的國軍以血肉相搏鬥的，其餘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敵軍，則是和中共軍互持着或者竟然是互通着。要是這樣的情形何以算做『抗擊』的話，則在華敵軍全部，完全可以說是被汪精衛所捉到的俘虜了。

如果說中共根本沒有同敵人作戰，那實在是有些冤枉；因為中共要想趁着現在的戰爭機會而奠定它的『根基』，自然不得不在敵後佈置一點兵力。這一點點的兵力，無論它是不是『抗日』的，祇要它去站在『敵人佔領區』的旁邊，敵人當然是非打它不可。中共既然要在敵後先佔一點『點』以爲日後發展爲『線』的基礎，自然也決不會白讓敵人打跑。所以，因此而發生接觸，事實上總應該是不可避免。

由於歷年來敵人『剿共』『掃蕩』『強化治安』的結果，使得中共懂得了怎樣對敵應付。朱德向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報告的『作戰經驗』，歸納起來，大概是：（一）敵人屠殺民衆而中共則爭取民衆。（二）敵人利於速戰速決而中共則持久拖延。（三）敵人利於集中而中共則設法使其分散。（四）敵人地理不明而



中共則消息靈通。中共憑着這幾項經驗，在敵後確是不斷的和敵人繞着圈子。縱然作戰的話，大部份的兵力也還是要仰給於當地的民兵，中共軍的犧牲是永遠不會很大的。因為中共派軍到敵後的目的，便根本上不是爲了『抗日』，而是做爲戰後割據地盤的準備的。

中共的兵員與槍枝的比例，據葉劍英說是五與三之比。中共軍爲了祇能打『游擊』，重武器在它們當然無法利用，而且也不可能有，擲彈筒和手榴彈雖能自造，而產量却並不多。所以，它們的最多的武器，便要算做步槍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所謂『陝甘寧邊區』裏所看到的三五九旅士兵，使用的槍枝以三八爲多，晉造次之，中正式有而頗少。據王震說，三八槍全是得自敵人的。可是，據華北淪陷區逃出來的人民說，河北省的中共游擊隊，所用的槍也多是三八，其來源則完全是購自僞軍。而並不是中共的戰利品。在敵後，中共用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來拉攏僞軍，僞軍向敵人領來的槍枝，也樂得賣給中共再向敵人報銷補領。

中共的兵力和武器都並不足道，中共軍最可以令我們注意的，到是『軍民合

作』問題。只有民衆才是國家最大的兵力，也只有民衆才是軍隊的最精良的武器。我們要預防中共軍的戰後割據地盤，先得要做到我們的國軍到處，民衆無不夾道歡呼。



# 中共的財政與經濟

毛澤東在解放社出版的『財政問題與經濟問題』一書中說：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但有許多同志，看重了財政，不懂得經濟的重要性，他們的腦子，終日只在單純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打來打去，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足影響經濟，但決定財政的却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

中共現在『陝甘寧邊區』所實施的財政政策與經濟政策，便是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段話來擬定的。所以，『陝甘寧邊區』的一切財政經濟工作，都以『解決問題』為其出發點。『解決』什麼『問題』，怎樣『解決問題』呢？毛澤東在這本書中又說：

延安歸來

五九

『我們的財政問題，就是幾萬軍隊與工作人員的生活費與事業費的供給問題，也就是抗日經費的供給問題，這些經費，都是由人民的租稅和幾萬軍隊與工作人員自己的生產來解決的，不發展民營經濟及公營經濟，就只有束手待斃。』

這幾句話是非常中肯的。『陝甘寧邊區』『生產運動』的着眼點，便是從這一個現實的要求出發。但是，它們並不是單單要『解決』工作人員的生活『問題』而已，與『解決』工作人員的生活『問題』並進的，它們還要求『事業』的『發展』，要『發展』『事業』，自然離不開『錢』字，要『錢』，當然就得從增加收入着手。所以，毛澤東在這本書中又說：

『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了發展經濟，忘記了開闢財源，而只圖從收縮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共的財政政策與經濟政策，是開源而不是節流，是『發展』它自己的『事業』，不惜加緊榨壓人民和它自己的軍隊與工作人員的勞力，



而不是『收縮』它的『開支』以培養國家民族的元氣。

因此，『陝甘寧邊區』的財政開支，也就有了它的特點。民國二十八年到三十年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裏說：

『我們的經費分配：用之於保護邊區的軍事費的支出佔第一位，用之於培養大批幹部的教育費就佔了第二位。行政費則極力緊縮！建設費的投資二十九、二十年二百多萬，三十年四百多萬。』

『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便這樣的被分配着，一直到現在為止。

中共『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在原則上，毛澤東所提的口號是『自己動手』；所以，無論人民也好，軍隊和工作人員也好，都要參加『生產』工作。軍隊和工作人員『生產』的收穫，要繳百分之三十給自己服務的機關，人民『生產』的利潤，則要分爲鹽、商業、農業三種納稅。其中尤以鹽，農的稅收最爲主要。

食鹽，是『陝甘寧邊區』出產的主要物資，凡是『陝甘寧邊區』不出產的日用必需物品，如棉花布疋之類，都要靠着食鹽換取，因此，在『陝甘寧邊區』的

財政收入中，食鹽便佔據了一個最重要的成份。在『陝甘寧邊區』的人民義務裏，運鹽也就成了一种最令人頭痛的担負。

據『陝甘寧邊區』的貿易公司總經理葉繼莊說：『三邊之鹽，儘人可取，但不能自由貿易，而必須售與財廳稅務局，出口則悉由光華公司經理。民衆運鹽爲義務性質，邊區各縣人民均有運鹽之義務，每縣（或每萬人）中每年應運鹽若干，及運鹽里程長短，均視事實需要平均分配。各部隊可自由運鹽與陝晉兩省交換必需物資，惟須經上級批准。』

三邊鹽價每駝（一五〇斤）三百元『邊幣』，（註：邊幣八元五角合法幣一元）加上稅收一千六百元，成本約合一千九百元，由三邊運至延安，需時二十二日以上，每日每駝運費至少七百元，運至延安後，已值一萬七千三百元。延安收價，三十三年六月份僅一萬六千元，而售價則兩萬四千元。所以，每人運鹽一駝由三邊至延安，除去約一個月的勞力損失不算外，還要賠本一千三百元。如果走的天數多，當然還不止此數。不過據『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長』南漢宸說：『民衆運鹽時不止一人備運一駝，運的數量多，則運費自可減少，並且交鹽時可以僅交一



百零五斤，所以民衆並沒有什麼損失。」這幾句話，縱然不是強辯之詞而百分之百的可靠，單以民衆近一個月的勞力犧牲而言，負擔也就可以說是「不爲不重了」。據山西省政府委員徐士琪說：因爲中共的部隊可以自由運鹽向晉陝交換物資，所以各部隊之間，搶運搶售的情形，頗爲普遍。結果，隨使得「陝甘寧邊區」出口的鹽價，有了很大的差別。」

這話是相當可靠的，「陝甘寧邊區」食鹽最大的市場便是山西，而山西和「陝甘寧邊區」的交易，便是由徐君士琪經理。

據南漢宸說：「三邊的鹽田，共有二千六百九十二畝，鹽工二萬一千一百二十二人，鹽家五百二十一戶，三十二年產鹽五十二萬一千駝，民衆運鹽十萬駝」。剩餘的四十二萬一千駝，南漢宸並沒有說明是怎樣運輸的，大概是除去「陝甘寧邊區」軍民的食用之外，都被各部隊所運售了。今年民衆運鹽的數量，據南漢宸說，「僅八萬五千駝」。這種運輸量的減少，如果是確實的話，一方面可以說是「陝甘寧邊區」食鹽出口的減低；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各部隊不經過「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正式手續而運售食鹽在日漸增多。

『陝甘寧邊區』的出口物品，另外還有皮毛藥材等項，不過和食鹽比起來，數量上差得太遠，重要性自然也不及食鹽大了。如果三邊的產鹽區不屬於中共的話，毛澤東所說的『束手待斃』，是很有其可能的。

『陝甘寧邊區』的發展經濟工作，目前是以農業放在第一位的。開荒和植棉，在解決衣食問題的迫切需求下，發展得異常的迅速。雖然陝北不宜植棉，棉花布疋還不能自給自足，而有關於農業的稅收額，却與食糧的增產而成爲正比的增加了。

據『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長』南漢宸報告：

『民間的開荒工作，三十年是四八一二六二畝，三十一年是三五四七六八畝，三十二年是七六三二七六、八畝，三十三年六五〇〇〇畝。』……『農業稅收：三十年是二十萬担，三十一年是十六萬担，三十二年是十八萬担，三十三年是十六萬石。』……『農民的負擔，到三十三年爲止，已減爲其全收入的百分之十四左右。』

『陝甘寧邊區』的農業稅，原先稱爲『救國公糧』，後來才改爲『農業統一



『累進稅』，以每人六斗五升爲起徵標準，不足六斗五升者免徵。六斗五升以上者，由百分之三累進至百分之三十五。農民對於地主的交租，最高額不得超過百分之三七五。毛澤東告訴一般農民：『三十二年要做到耕三餘一的程度』。據南漢宸說：『三十三年內一般農民已經可以耕二餘一了』。在『陝甘寧邊區』裏，農民們的勤儉和誠樸，實在是值得讚美的。

『陝甘寧邊區』的農業發展，在中共加緊榨壓農民的集體努力的威迫之下，進展的速度是異常可觀的。軍隊的開荒成績，也一年年的有着很大的進步。據『陝甘寧邊區建設廳長』高自立說：『三五九旅三十三年可收糧三萬石，除食用外，還可以交一萬担公糧。』

『陝甘寧邊區』農業稅收的另一特點，便是不收錢，祇收糧，各縣所收的公糧以區爲單位的儲存在倉庫中，並不集中起來。據『陝甘寧邊區政府』二十八年到至三十年的工作報告中說，這是爲了『可以使軍隊在作戰時期，打到那裏，吃到那裏。』

『救國公糧』是每人實收四百斤起徵，徵收率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卅。其不

同於『農業統一累進稅』的，是一方面訂有征收累進比率的條例，一面又有着指定要完成若干担的任務。據南漢宸說，『農業統一累進稅』，便是根據『救國公糧』的標準製訂。是否同時並收，南漢宸並沒有加以說明，實際上也許可能是兩種稅收都一竄的在並行着。而以『農業統一累進稅』的稅收歸於『陝甘寧邊區政府』；另以『救國公糧』所收的實物分區儲存，以爲有軍事行動時的軍用糧食。

『陝甘寧邊區』的工商業，是幼稚得十二分的可憐的。但是，在它的發展和管理上講，却也有着不少的特徵。

第一：『陝甘寧邊區』的工業，是近兩年才逐漸發達起來的。據高自立說：『爲了事實上的需要，今年在發展經濟計劃中居於第一位的農業，明年或將轉爲第二，而原居第二位的工業，很可能的將居於第一位。』這句話，是相當的可靠的。一方面它說明了『陝甘寧邊區』的軍民在胼手胝足的努力下，吃飯已不成問題，另一方面，它也說明了中共爲着『發展』它的『事業』，對於工業的發展是如何迫切的需求和努力。三十五。最近兩年之能夠由艱苦困難中一步步的走向軌道



，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說：「要使得中國走進工業化國家的領域裏去，首先得先從發展手工業做起；如果連手工業都可以做的東西都要買舶來品，還修談什麼建立機器工業，豈不是捨近求遠？」（毛澤東三十三年七月四日對中外記者談）這幾句話便是「陝甘寧邊區」發展工業的方向計，所以，在「陝甘寧邊區」裏，手工業的發展是很大的，差不多除了可以耕田的民衆之外，幾乎沒有人不在紡織，就是機關工作人員和一般的民間婦女，也無不人手一件紡紗機。甚至各校學生教員也難例外。三十二年民間紗婦便有十六萬三千四百五十七人。紡紗八三五八四九·九斤。三十三年機關紡紗人員共有一萬一千人，共紡毛紗六七七九斤。這個數目雖然並不算大，可是按照一百四十多萬的人口的比例講來，動員的成績和出品的數量都可以說已經是相當可觀了。

「陝甘寧邊區」的機器工業，到現在仍是異常的幼稚的。除了軍火製造，藥品製造之外，其他如紙張磁器以及一般日用物品，都還是以手工製造者爲多。藥品製造方面，大概可以提煉中藥的丸或散，嗎啡安甯等也漸能自製。軍火工廠則以製造手榴彈爲大宗，做造中正式的步槍，式樣尚佳，惟槍身過重，鋼質不純。

擲彈筒之製造頗爲有趣，其法係以原鐵煉成長條，再將長鐵條盤爲圓筒，最後再加以捶煉，故筒身雖爲鐵製，而耐熱程度與伸縮性則遠較一般鐵製者爲強大。其用心誠可謂不爲不苦矣。

「陝甘寧邊區」的工廠，多半係由公營。故一切工業成品，均無稅收。也就爲了多半是公營工廠，所以管理也比較容易。節約兩字，確實是做到了至已盡已。而廢物利用，卽至一草一木之微，也絕對不准棄置不顧。這可以說是第一個特點。非必需物品絕不製造，已能製造的物品絕對不許向外購買，這可以說是第二個特點。由於這兩個特點之保障，「陝甘寧邊區」的工業，才一步步的走入軌道，以進正途。

第二：「陝甘寧邊區」的商業，現在仍是原始型以物易物制。雖然也有貨幣的交易，實際上仍是以物計值再加折合而已。

據南漢宸說：「陝甘寧邊區的私人商業資本約十二萬萬四千四百零一萬邊幣

。公營商店的資本額，南漢宸並沒有報告，據公營商店的規模遠較私營商店爲大（如南昌公司等）看來，資本額也許還不止此數。因爲私營商店資本小而又分



敵的家數多，公營商店資本既大而又集中，所以物價的控制，也就比較簡單而易於收效。在「陝甘寧邊區」內，差不多每個機關每個部隊都有着合作社的組織的，這種合作社，便是民營商店的勁敵。

「陝甘寧邊區」的對外貿易，是有着莫大的困難的。由於「警戒線」關係，使得進出的物資有着極大的差額，更由於這種不等價交換的關係，「陝甘寧邊區」內的物價，也就不得不隨着各省的物價而頻起漲跌。據葉繼莊說：「三十二年內，邊區的鹽價漲了五倍多，土布漲了十八倍多，棉花竟漲到二十八倍以上。」我們對於「陝甘寧邊區」的「警戒線」，是有着相當的作用的，在財政上，確是給予了中共以莫大的威脅，但是對於中共必需的物資，却並沒有「警戒」得住，據說，每一駝（即一匹牲口所駝行動的重量）貨物，只要多花上三千元法幣的走私費，無論進口出口，便可一切都不成問題。據洛川的民衆說，「警戒線」上的一個連長，每年的額外收入，竟可能達數十萬元之多。相反的，「警戒線」也有着很大的副作用。「陝甘寧邊區」內「生產」工作的進展，一般生活水準的降低，以及造成「陝甘寧邊區」內民衆不知外面的實情而一任中共愚弄等等，也

無不是由於「警戒線」而產生的惡果。如何防止此種副作用的發生而加強「警戒」的實效。實可謂對付中共問題「當今急務之一」。

在「陝甘寧邊區」內，工業因為全係公營，所以沒有稅。商業稅呢？據「陝甘寧邊區政府」廿八年至三十年的工作報告說：「廿九年冬，寒衣代金向商人募得三百四十萬元邊幣，卅年製定商業累進稅條例。因稽算困難，每市每年估價一次，規定每月每家納多少。」從這一段記載裏，大概可以見到商業的稅收也相當有限。另有一種「通過稅」，是對於「陝甘寧邊區」運銷外省的貨物的稅收，但是，主要的物資輸出既已由公營，則此種「通過稅」的收入當然也不會很大。

「陝甘寧邊區」的稅收既然不過如此，中共的「軍事費」與「事業費」怎樣維持呢？據「陝甘寧邊區政府」二十八年至三十年的工作報告中說：「政府收支，全靠特種收入，沒收，戰爭繳獲，銀行貿易局的營業等。」這裏所說的「特種收入」，不知究竟是什麼東西。據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洛川所見到的幾位由中共軍內逃出來的戰士說：「陝甘寧邊區內是種有大批鴉片的，種植的地點多在離開公路三十里以外的山溝內，種煙的多是部隊裏的士兵，民衆種煙，則絕對的禁



止。』這種特種收入，很可能的是指鴉片而言。『銀行貿易局的營業』。大概就是發行偽幣了。

中共之發行偽幣，據『陝甘寧邊區銀行總經理』黃亞光說：『邊幣之發行，係因政府停發八路軍之軍餉，三十年才開始發行二元五十元的邊幣，三十年以前所發行者，僅係光華代價券，票面亦僅二分五角一角七角五分四種，因係專爲法幣找零之用，故未超過一元。』但是，『陝甘寧邊區』內現在流通的『邊幣』，起碼是五元一張，最高額有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以至一千元者，二元之『邊幣』已不易找，聞尙有一元之『邊幣』，想係發行期過早，故黃亞光不肯承認。然七角五分以上不從一元發行起，即逕行印發二元之票面，天下寧有是理，寧有是事？

中共之大量發行偽幣，其用心無非搜括民間物資，以換取法幣，貨物。但是，中共之偽幣，因其保證不足以取信於人民，故波動極大，據黃亞光說：『最初邊幣與法幣的比值是一比一點五。即法幣一元，可換邊幣一元五角。二十二年因邊區人心浮動，法幣需要量激增，一時會漲至一與十之比，後來情形漸定，生產

增加，才又穩定下來。」到三十三年七月爲止，「邊幣」八元五角，可換法幣一元。法幣在「陝甘寧邊區」內是禁止使用的，兌換時也要經過審查。

中共的「陝甘寧邊區銀行」有着兩種作用：第一：發行偽幣週轉財政。第二：支持合作社（公營商店）的業務，以吸收民間的游資貨物。

關於財政週轉方面，據南漢宸說：「因爲封鎖關係，邊區對外貿易受到不等價交換的壓迫，致財上略感不支，三十二年向銀行的透支額即達邊區財政支出總數百分之十八，今（三十三年）年因不少軍隊由外面調回，故財政預算又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希望靠自己動手發展生產的結果，不再向銀行透支。」這段話裏有兩點可以注意。（一）去年透支額百分之十八可能不止此數。（二）今年財政預算的增加是爲了有大批軍隊調回。

關於支持合作社業務方面，中共的辦法是很好的。「邊區銀行」的放款如農貸之類要透過合作社，民衆的物資貨幣，均可加入合作社作爲股東，因爲合作社太普遍了，又有着「邊區銀行」作爲保證，所以還能得到一般人民的信仰。發展得非常迅速。到三十三年二月底爲止，「陝甘寧邊區」內已有消費社二八一，生



產社一四，運輸社二三三，信用社六，農場社七，醫藥社二三。

一般民衆有了實物或貨幣以後，因為合作社的利息很高，都願意大批入股。合作社既然掌握了大批的游資和實物，當然就可以向「陝甘寧邊區」以外去做買賣。於是，合作社便用人民的本錢來做生意賺錢，對於中共的財政經濟，當然也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合作社的另一特別業務，便是收運鹽代金，「陝甘寧邊區」民衆因為人人都

有運鹽的義務，如果不想運鹽的話，便得要以五六千元交給合作社入股，用這批股金的利息，作為合作社代為運鹽的費用，而不必再去親自運鹽，這筆收入，按照一百四十多萬人口的比例看來，數目上大概是相當的可觀的。

「陝甘寧邊區」的合作社在吸收民間游資上，幫助中共解決了不少財政上的困難；在幫助「邊區銀行」發放貸款上，也給一般民衆以發展「生產」上很不少的便利。因此，在中共的財政問題與經濟問題中，合作社是佔着一個很重要的成份的。

綜括起來說，中共的經濟上的特點，是適應需要，加緊「生產」；在財政上





# 中共的宣傳教育與社會生活

有人說：「中共的成功，軍事僅佔十分之三，宣傳則要佔十分之七」。這句話，如果僅當做形容詞來用，實在是不為過火。中共的宣傳，確是具有着獨特的優點而收穫到相當的效果的。

中共的宣傳方法，是儘量攻襲我們的弱點，儘量闡揚它自己的優點。對於它自己不會做而我們也還沒有做好的事件，如對日戰爭等等，則竭力渲染我們的失敗而大肆鼓吹它自己的實力；對於我們忽略了未曾做而它自己也僅僅做了一點的事件，如改善民間衛生等等，則謾罵我們的落伍而讚美它自己的前進。中共的宣傳和它的實行是有着密切的聯繫的。凡是它宣傳上認為輕而易舉的事情，大都是用不着它來做而它也無法去做的；凡是它宣傳上認為困苦艱難的事情，則大都是它已經在做或者是已經做的多少收到一點成效了。這一套戲法的運用，中共確是有着相當高明的技巧。

同時，中共更運用組織的力量，將教育文化也全部收集在黨的宣傳政策下來進行活動，使得一切可以對於民衆思想上發生關係的東西全都離不開黨的宣傳原則，則其所收的效果，當然也就可以悉如預期了。

中共對於黨辦報紙是異常重視的。黨報的負責人多是中中共委，毛澤東自己以及周恩來等，也都要直接參加黨報的指導工作。因此，無論是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或是重慶所出版的新華日報，其版面上的一文一字，無不與中共的宣傳有關，無所謂而不起任何用的文章，大概都很難在這兩報發現。

中共的宣傳有兩個着眼點，（一）抓住機會。（二）抓住對象。中共在發動任何宣傳之初，必先考慮到這兩個問題，然後再決定宣傳的方式和內容。中共的宣傳材料，多半是以某種事實爲背景，再透過政治觀點加以渲染烘托；空洞的理論文章，以及高深的長篇演說，在「整風運動」以後，都是被打入「黨八股」之中而絕對禁止的。

中共宣傳上的最大特點，便是進有收穫，退亦成功。它發動任何宣傳攻勢時，一定要顧及到成功和失敗的兩種後果。



例如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延安慶祝聯合國日之際，正值瀘關危急，臨寶失守，中共便臨時加上了一個『要求國民政府給八路軍新四軍發槍發餉發藥打到敵人進攻的地方去』，以及『保衛西北，保衛西安』等口號。在中共自己，何嘗不知道自己作戰的能力不足以當正面戰場？又何嘗不知道國民政府絕不會視戰爭如兒戲驅螳臂以當車？但是中共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其目的大概不外二端：第一：設若政府令其派兵助戰，則『警戒線』自可撤銷，餉械必能發下。第二：設若政府不准其要求，則彼正可以此作爲攻讟我們的藉口並激發『陝甘寧邊區』人民對於它自己的同情。

這是中共宣傳攻勢的一個典型例子。這種宣傳攻勢是具有着相當的力量。它開會的宣傳是如此，利用報紙的宣傳也是如此，其他如利用『秧歌』『活報』等等的宣傳也無一或能例外。

中共的教育，也是在黨的宣傳之下進行的。『陝甘寧邊區教廳』審定的高級小學歷史課本編者辛安亭在書末『編者的話』中，便明寫着『這本書是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定的小學歷史課程標準草案編寫的』。所以，這部歷史教課書的第三

冊第十課，是：『國共分裂以後，領導革命的不再是國共兩黨而只是共產黨了，革命的敵人，却不只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了，主要的革命階級只剩下工農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因此，從廣州起義開始，共產黨就領導中國革命走上蘇維埃革命運動的階段了』。中共教育黨化之明顯，於此可見一般。甚至范文瀾所寫的『中國通史簡編』，也一味的歌頌流寇盜匪，而譽之爲『無階級的革命』。

如果用一個教育學家的眼光來看中共的教育，其缺點之多，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不過中共的教育是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指導之下進行的，一切課程的編訂自然都是以黨的利益爲皈依，所以，凡是我們認爲的缺點，却正是中共自己所認爲的特長，凡是我們覺得不適合國家民族的需要東西，也正是中共所以能收到暫時效果的憑藉。

中共現在所辦的學校，一共有三個：一個是直屬於中共中央的黨校，一個是直屬於中共軍委會的抗大，另一個則是直屬於『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延安。這三個學校分工是很精密的。黨校是中共專門訓練黨的幹部的所在，抗大則是軍事技



術人員的訓練所，延安則專爲培養行政上所需要的人材而設。三校的任务既然不同，則教學的方法當然也就各異了。

黨校的一般教育，是中共教高級幹部們在理論上怎樣將馬列主義「透過民族形式」。這一種課程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親自擔任的。關於業務的應用部門，則偏重於小組討論，使得各個學員彼此明瞭其業務上的困難，並集體討論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在黨校受訓的人員，都是調集起來的；學員的成份，是黨政軍學文化各部門的負責人都有。

抗大是專門訓練軍事人材的。其一般的教材除了照例捏造許多故事，以培養其學員對於我們的仇恨外，關於軍事技術方面，聽說有兩種訓練，一種是對付日軍的，一種是對付我們的。這兩種訓練的課程，都是根據着對方作戰的弱點而編訂。據朱德說：「中共軍對於步步爲營的梅花陣的應付，目前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抗大受訓的學員分爲兩種，一種是經過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軍官，另一種則是新近招考的青年。軍隊政訓人員的訓練，也包括在抗大內而另行編成一隊。

延安是分做好幾部門的，有行政學院，有自然科學院，有魯迅文藝學院。三個學院的共同課程是毛澤東的「政治理論」及中共的「革命人生觀」與「時事教育」。業務上的應用課，則全是爲了應付「陝甘寧邊區」的目前需要而定。學生除了「邊區」「蘇聯」以外，簡直不知中國世界爲何物。中共也正是要學生除了「蘇聯」不知有天下，除了「邊區」不知有中國。使得每個學生所學的東西出了它的小天地便不能致用。學生的來源分調訓招考兩種，教授則全係現在中共各部門的工作人員兼任。學生在校內讀書的時間佔百分之六十，而在校外實習的時間則佔百分之四十。

中共在這個學校裏實施的教育，實際二字，是的確做到了的。如果僅在中共現有地域而言，可以說是確能「學以致用」，要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講，真不禁令人爲這批統中共所愚弄的青年哀，同時又爲中國將來建國的前途懼。

中共的教育是這樣，中共的文藝政策也是這樣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便很明白的說：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藝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一定的黨，或個



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爲藝術的藝術，超階級超黨的藝術，與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因此，在中共統制下的「陝甘寧邊區」內的文藝，便一定要屬於中共的黨，中共所倡導的無產階級，中共所指定的政治路線了。所以，毛澤東反對「人類之愛」及「抽象的人性」，而認爲「在階級社會裏，只有階級的愛」，延安的作家們便得跟着他的指示寫。毛澤東反對寫「黑暗」，而認爲「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爲主，他們也寫些工作中的缺點，但這種缺點只能成爲整個光明的陪襯，並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於是，延安的作家們便又得跟着這一指示寫。

但是，「人類之愛」是從「人性」出發的，同一黨同一階級同一政治路線的人并不一定都有「愛」的存在。所以，中共的黨員王實味竟然寫出了一本「野百合花」，不顧一切的壓力而吐露了他對於現實的不滿與「恨」意。所以解放日報的編輯丁玲，也爲了在「陝甘寧邊區」內找不到什麼光明而至於擱筆數年之久。如果「陝甘寧邊區」內可以算作有文化的話，這文化便是屬於中共的宣傳之

下的一種工具。單從宣傳的立場而談，中共對於文化的運用是很高明的。無論在任何文化活動，都要照着毛澤東的指示將「工農兵放在第一位，小資產階級放在第二位，」效果上，當然是相當的良好。但是，中共統制下的區域內的作家們，却都感到這種生活是太寂寞了。

「陝甘寧邊區」參議員蕭軍，便曾對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說出了他內心的寂寞。他說：「我在延安有兩怕，一怕寫了文章無處發表，二怕這裏沒有社會生活。」

提起「陝甘寧邊區」內的社會生活來，真是可以說單調得不近人情。毛澤東隨時都在讚美着的工農兵，整天除了「生產」以外沒有過問其他的權利；一般智識份子，也整天的被迫着在和自己天性不合的主義下搖動吶喊。工農兵的要求是比較少一些的，但是，智識份子們却忍受不下這種寂寞了。於是，延安的各機關裏便產生了一「星六舞會」，「透過民族形式」的馬列主義宣傳品的「秧歌」，也便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情形下在「陝甘寧邊區」盛行起來了。

「陝甘寧邊區」生活的單調，是很少被一般人深切了解的，也許，還有一部



份讀過『野百合花』內『無迴金蓮步，歌轉玉堂春』的人士，還認爲延安的生活極盡其腐化之能事。殊不知『歌轉玉堂春』的歌，並不是『蘇三起解』，而是宣傳意味極其濃厚的秧歌；『無迴金蓮步』的金蓮，也並不是高跟鞋履，而是大鑼大鼓制服草鞋。中共便靠着這『歌』才『解決』了二百四十萬人社會生活的簡單『問題』，中共也靠着這『舞』，才維持住男女比數十八比一的工作人員不朝外跑。我們決不能祇看到『歌』『舞』兩個字的外形便決定中共的腐化，我們應該進一步的從這『歌』『舞』上找出其用心的所在與效果來。

便爲了『陝甘寧邊區』一般人民的住生活過分的簡單，所以生活的維持也就比較容易。工農兵自己動手紡紗種地，吃飯穿衣當然可以不至發生多大的惶恐，公教人員的供給制，雖然在『野百合花』裏說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但是，這僅是差別問題，而不是有無的分別。同時，更爲了大家都是差不太多，爭執自然也不會太大。據『陝甘寧邊區政府』貿易公司的總經理葉繼莊說：『公教人員因爲自己也同時生產的關係，在生活的享受上，比一般人民還要多少優裕一點。』這話雖不盡可靠，可是『一般公教人員生活上的安定，大概也差不太遠。工人

的待遇，在「陝甘寧邊區」內是最好的，據高自立的談話看來，可以說是比後方的情形好得太多了。我們縱然將高自立的話打上一個折扣，也要比「陝甘寧邊區」內的其他人主爲高。我們如果看清了中共爲了需要工業發展的迫切，則中共對於技術人員的重視，自然是意料中事。因爲中共的工廠裏的工人除了勞力的時間過多之外，衣食住的各方面，以及家屬的瞻養等等，確乎是可以不必顧慮。加以各廠對於勞力榨壓的程度，幾乎如出一轍，工資上雖也有着全面工資，（即全發偽幣）混合工資，（即偽幣實物各半）津貼工資，（除供給實物外再加發偽幣）計件工資，（以件計酬或發實物或發偽幣）等四種區別，實際上却并無二致，是以工人的跳廠怠工等事，在「陝甘寧邊區」內是很少發現的。

「陝甘寧邊區」裏的人民所過的生活既然異常的簡單，則訴訟的事情，自然會比較的少。中共是不大用條文的法律的，在「陝甘寧邊區」內，司法也就附屬於行政而不獨立。一個「高等法院」以外，還有一個「延安市地方法院」，各縣裏也都設有一個「裁判員」，主管訴訟案件。

「陝甘寧邊區」對於民事的或刑事的訴訟案件的判決，是並不根據任何條文



的、最通常所用的辦法是調解（即所謂馬錫五審判方式）和公開審判。中共對於這種方法的運用，是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的。第一：調解和公開審判可以標榜民主。第二：公開審判時可以用黨員激動民衆的情緒，而使其對於被審判者的處罰預期，得以藉民衆的『意見』而實行。

中共的司法既然是不用條文而要以黨的意識去審判『犯人』，則中共的特務組織，當然也就不問而知。毛澤東說：『如果說我毛澤東不殺人，恐怕連鬼都不會相信。不過殺人不能解決問題時，我決定一個人都不去殺。』這話是十分真確的。中共的特務頭子康生，便是這話的忠實執行者。中共對於反對它的人們除了非殺不可以外，大概都是用所謂『爭取』的方法來處置的。但是，中共的這種『爭取』，却要比殺還來得嚴厲。

中共特務機關『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現在便流行着一種『疲勞檢查』的刑法，所謂『疲勞檢查』，便是用一二十個特務人員向它認為有問題的對象去盤問，使對方不能休息，日以繼夜的回答問題，到了對方疲勞過度意識模糊的時候，當然就無問不答了。等到對方照它的意思回答了以後，中共便要對方去向羣衆承

總自己的錯誤，這就是所謂的「坦白運動」，按照「三章」三章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的說法看來，中共這種「奪志」的刑法，其殘酷可以說是舉世無匹的。

「陝甘寧邊區」之所以近十年沒有發生問題，可以說是中共運用黨的宣傳教育圍圍人民思想的收穫；也可以說是中共運用黨的司法特務監視人民行動的功的意義，失去了一個人的自由活潑的原始精神。

中共的這種「奪志」的刑法，其殘酷可以說是舉世無匹的。中共的這種「奪志」的刑法，其殘酷可以說是舉世無匹的。中共的這種「奪志」的刑法，其殘酷可以說是舉世無匹的。中共的這種「奪志」的刑法，其殘酷可以說是舉世無匹的。

中共的這種「奪志」的刑法，其殘酷可以說是舉世無匹的。中共的這種「奪志」的刑法，其殘酷可以說是舉世無匹的。中共的這種「奪志」的刑法，其殘酷可以說是舉世無匹的。中共的這種「奪志」的刑法，其殘酷可以說是舉世無匹的。



# 附錄

## 我們還要再加努力

### 前言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於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由渝出發，經陝西入山西，再跨黃河經由陝北返渝，歷時共兩月又十天，其中以在陝北參觀時間最長，共約四十三天之久，以在克難坡參觀時間最短，僅居留三日又半，西京雖兩度經過，為時亦不甚多，然片斷印象中，亦未嘗不可以窺其大略，因就見聞所及，草成『兩度過西安』與『克難坡三日記』兩文。『兩度過西安』，係專供當局參考，故對作者個人不敢深表讚同之處暴露較多，而『克難坡三日記』則因係報章發表文字，凡足以引起刺激誤會之處均力求避免，而閻先生苦幹的精神，也實在是足以令人感動。所以，常作者將『克難坡三日記』收入本書時，并未將原來發表於六月

十六日商務日報的原文加以刪改。

## 兩度過西安

陝西省政府主席祝紹周，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由延安返抵西京後，曾與各記者作了一次長談。分別徵詢各記者西行觀感如何？祝氏致詞中曾說：『本人因爲主持省政關係，很少機會能作一次較長時期的旅行，並且爲了職務的不同，在各地也很難看到一切的缺點有諸君這樣的詳細。這次各位的延安之行，收穫一定不少，在陝西境內的各縣中，諸位也都有過幾天的勾留，我們很希望能從諸君的口中知道一點中共的長處，來作爲我們的參考，更希望從諸君的觀察裏，多知道一點我們自己的短處，來努力的加以改進。』祝主席以軍人從政，頗得陝民愛戴。這幾句話，更足見其勵精圖治之心。

但是，訓政時期的工作，是要逐步漸進的，其進銳者，其退必速。祝主席求進之心過切，措施上隨難免操之過急之評。即以陝西省之物價管制而論，祝主席之方法十分之七在於對人，而十分之三在於對物，故今日之收效見功，誠屬不可



否認，設若偶遇天災或有人事變動時，則陝西省物價躍進之速度，恐勢將較之今日之減低爲尤烈。

祝主席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初抵長安之日，曾經說到陝西省的物價問題。祝氏說：「本人對於囤積居奇之豪紳富賈，凡屬查有實據者，決予最嚴厲之處置，一般民衆，因爲深知本人在陝南的作風，任何事決不苟且，所以本人就任省府主席時，車輪過處，物價隨低。」這話是很可能的。由於祝主席辦事之剛毅明決，陝西省的物價，確乎是已經平穩，但是，我們應該要知道陝西省物價平穩的原因，另外還有着一個重要的成份，是陝西省的今年五穀豐登萬民鼓腹。物價管制的基本問題還是在於管物，如不重於管物而偏重於管人，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也。本之不固，標何者焉豈稍有不測，勢將殞越隨之矣。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陝西省內，曾走了五六個縣份，各縣中也都有着不黨區黨部或分團部的設置，一般民衆對於黨團的工作，確似乎是還沒有什麼非議，好評呢？同樣的也是沒有。在表面上看，似乎各地的黨團工作還算不差，但是，

這種不好也不壞的輿論，却正是我們黨團工作之所以失敗的重心。  
天下事不好即壞，不壞即好，所謂不好也不壞者，正足以說明此事之對人無損無盜。黨團是民衆的導師，黨員團員應該是民衆的模範。如果我們的黨團工作竟然對於人民無損無益不好不壞，而僅成一黨員團員之登記機關，何能協助政軍執行工作？更何能發揚主義教育萬民？

在陝西省內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也許都相差不遠，究其內在的原因，我們幹部的不夠了解民衆深入民間實應負最大的責任。

青年團陝西支團部門口一人多大的「團長尊嚴」四字，如果同中訓團浩氣磅礴觸目動心的「頂天立地，繼往開來」等字比較起來，便十足的暴露了我們中下級幹部的不夠切實的作風。團長的偉大，在今天可以說天下之大，早已有口皆碑。在國內，團長是一國的元首，民族的領袖。在國際上，更是世界四大領袖領之一，解放弱小的民族的先鋒。尤其是抗戰以來，團長領導全民以積弱的國家，首先揭起世界上反侵略的義旗，而與軸心宣戰，七年中奠定了我國最後勝利的基礎。廢除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實現了總理遺囑中的最大願望，建立了世界永久



和平的初基，不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團長的豐功偉績，無人能與倫比，即寫入世界歷史中，也可以說是一朵奇葩光彩獨異。今天，我們幹部所應該做的也可以說是團長需要我們做的，不再是對於團長的歌頌，而是要我們去埋頭努力！怎樣使得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國工作立下萬年不拔之基礎，怎樣使得整個世界局面，迅速走上大同的道路，讓世界歷史中的這一朵奇葩永不彫謝，這才是我們黨團工作的當前的急務，這才是我們黨員團員的工作的重心。

陝西省政府委員張大同同志，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由延安返抵西京時，曾在祝主席的歡宴席上，問作者『是不是可以用一個政治攻勢來解決中問題』。張同志的這一種想法，真可以說是頗足爲我們一般幹部的代表。我們的一般幹部，從全國統一局面形成之後，頗有不少由於長處順境的關係。而養成了一種特殊的自尊心與誇大效果的習慣。對於一事之來，並不仔細研究，以求澈底了解再去應付，對於一事之往，亦不究其失敗之徵結而僅憑想像來判斷其成功。張大同同志要想用一種政治攻勢來解決中共問題，實在是可以說既不

知己而又不知彼。西安公祭延安文化人的笑話，其產生的原因，也便是由於我們的沒有更多的考慮。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時，被西安所祭的吳伯蕭便向着大家說：「王實味現在活着，我吳伯蕭也在活着，我們不但都活着，而且活得恐怕比諸位還要健康。」吳伯蕭這話是很刻毒的，他同時並一再提到祭他的主祭人是谷正川同志，作者爲了遵守團體的紀律，沒有答復他的權利與義務，所以，祇好向同座的幾位延安文化人說：「生與死的分野是很微妙的。『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的古訓，是我國一貫的傳統哲學。現在自承『托派』的王實味今天的『身』，誠然是不可否認的還在活着，而他的『心』，却可以說是已經死了，至少，他寫『野百合花』時的那顆『心』，確是已不存於現世。如果這種說法是我國大多數人可以同意的話，西安的這一『祭』，也未嘗沒有道理」。

但是，憑心說來，西安的這一次宣傳攻勢是失敗的，失敗的主要原因，可以說是由於我們幹部的特殊自尊心的太強而忽略了『知己知彼』的名言至理，失敗後而盡人皆知始爲笑柄，其主要的原由可以說是由於我們幹部的專好誇大效果而



使得自己的弱點暴露無餘。

青年訓練機關，除去第七軍分校不算外，在西安共有兩處，一個是戰幹團，一個是勞動營，這兩處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都去參觀過。在生活紀律方面，或者還可以說沒有什麼可以非議，但是，在精神的訓練上，則使人頗有找不到中心之感。

戰幹團是培養戰時工作幹部的所在，對於抗戰所能發生的效果，應該是有着很大的貢獻的。但是，實際上受訓的學員不過是爲了混上一層資格，教官們則僅僅是爲了維持目前的生活。教官照書教，學員照書學，教完學完，大家興盡而散，從此天涯海角，甚至老死不相往來。學者固不知爲何而學，教者亦不知爲何而教，茫茫然來，茫茫然去。國家費鉅萬金錢，訓練出來的青年不知爲何工作，如何工作，在抗戰中真可以說是一種物質上與精神上莫大的損失。

據聞戰幹團在陝西所辦生產事業，爲數頗不在少。并傳說戰幹團爲教育長武啓曾對學生說：『戰幹團之辦生產事業，是爲各學員的戰後工作打算』。

延安歸來

九三

如果此話屬實，何不改戰幹團爲戰後商人養成所，設能節省舉辦『生產』事業之經費，多與畢業學生取得密切聯繫，指導其工作上之問題，解決其生活上之困難，再從而加緊內部現有學員之精神訓練，以提高其對主義的認識，培養其獻身黨團之個性。則戰幹團之使命，庶可名實相符，而在抗戰中發揮其莫大之力量。

勞動營是一個特殊的青年訓練機構，其教育方面自只應較一般訓練爲特殊，據谷正鼎同志說，『訓練期間最長兩年』，而外間傳說，則有數年不得外出之謠，外籍記者中有以『勞動營』爲『集中營』者。其原因，實由訓練方式之未能運用得當有以致之。

勞動營中受訓青年，多數爲思想誤入歧途者，舉千數以上之思想複雜之青年於一堂，而授以一如戰幹團之一般訓練與更嚴格之管理，其不能完全接受，實在於是於理於情，都爲意料中事。我們應該知道這些青年的思想之所以受邪說之誘而橫流，亦必有其客觀的環境與事實所驅使，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強行訓練的結果，不是使其對於人生感到煩膩，必會使其痛惡現實之心理今後更爲加強，能從目前勞動營之訓練中而對於本黨有深刻之認識與信心者，誠恐百十人中不可得



倘若勞動營能對此輩青年之心理加以詳細之分析，究其所以誤入歧途之原因，稍加訓練後，即將其分發至適合個情之機關實習，使其從週圍環境中認識本黨主義之博大深遠，使其從實際工作中明瞭一切措施之不能盡如人意，再從而使本黨之健全幹部予以人格上之感召與精神下之薰陶，其收效之速，或可較此二年為佳。在中共正向國外以「控制青年思想」向我們發動聯續攻勢的今天，我們對於思想錯誤的青年之訓練，實在不能再三的加以考慮以求改進。特種青年訓練，是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決不能祇看作應付目前需要的工具，而一任其無聲無嗅，苟且敷衍，以至於喪了很多的大好青年不能挽救，斷了建國途中的無限元氣而無法保存。

### 克難坡三日記

克難坡，真是個奇怪的地方。

山澗裏溪流潺潺的聲音，當夜深人靜時，睡在床上，可以從枕頭中聽到回響。

延安歸來

九五

，可是，你如果要想汲取這股水源來作爲飲料，便至少要跑到兩個鐘點以後，你的手指，才能夠真正的和那些綠波接觸。

然而，這個地方，却是山西省政府的所在地，第二戰區抗戰前線的司令台。

這裏，看不出誰是官佐，誰是士兵。同樣的，也看不出誰是學生，誰是教授。每個人，都有着一套同樣的草綠色的軍服，每個人，都有着同樣的布鞋和皮帶。小學生和女人，也全都穿上了戎裝。

這裏，沒有商人；也沒有房屋。一切的事業，都由公家經營，所有的人們，都住着一樣的窯洞。窯洞內，有着充足的光線和潔整的土牆，到夜晚，有着比重慶還要明亮的電燈。

因爲一切都由公營，所以物品的價格，比各地都要便宜；萬能洞內合作食堂的經濟餐，每份僅收法幣一元。因爲大家都住窯洞，所以物質的享受也沒有什麼不平；高級官員的住宿飲食，和一般士兵並沒有兩樣。

五年前，這裏還是呂梁山中一座荒蕪的山峯，今天，這裏却已變成保衛中原的一座堅強堡壘。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兼代山西省主席的閻百川先生，便經常的坐鎮在這座堅強的堡壘內，他每天有着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他每天有着同士兵們一樣的堅苦的生活。他維繫着山西省一千一百多萬的人心，他策動着一百幾十萬軍民的抗建工作。爲了他埋頭苦幹的努力，山西省對敵作戰的軍民，都加強了必勝的信念，爲了他不斷研究的進步，淪陷區奮鬥掙扎的同胞，都提高了重見天日的希望。閻先生是同盟會的老會員，今年，他已經六十三歲了。

克難坡的公務人員和民衆，每天都要工作十二小時，四點半，天剛亮的時候，集合場上便擠滿了一樣衣飾的人羣。閻長官，照例要在這時訓話，告訴工作幹部和民衆們以做事做人的道理、講詞的原文，並同時廣播到附近的區域去。訓話完畢，一天的緊張活動，便從此宣告開始。

這裏的人民，每天除了八小時自己的工作外，還要拿四小時來替公家服務；公務員除了八小時爲公家服務外，再以四小時來做工補助自己的生活。公務員的眷屬們，沒有一個人是不勞動而坐享其成的。閻長官的家裏，便種有一小塊菜地，飼養着好些鷄豬。可惜，閻長官家裏的菜蔬和牲畜，三天內差不多都要被我們

這些不速不客替他吃光了。

當我們爲山西省當局豐盛的招待而感到不安時，閻長官便寫了一封信給招待我們的王念文先生。信裏說：

『念文：你說鄧副領隊對我們以客飯招待來賓，表示不安，你可以替我告訴鄧副領隊，我們中國的道理，是以物表心。我受的家庭教育，是節自己一月之食，優待客人，才能表示尊敬客人的熱忱。諸君來此做客，我應當節我之食以待諸君，雞蛋是我家裏自己的鷄下的，豬也是我自己家裏喂的。我們如果是定量分配的地方，我祇有按定量分配的飯來招待客人，以符規定，我們既不是定量分配的地方，如果以定量分配的飯來招待客人，反而成了作僞，失了敬客之道。山手。五，二十七』。

閻先生這種真誠，使我們深深的受到了感動。第二次，我們在恭祭趙故主席的途中，參觀了閻先生所種的菜地和飼養的牲畜。第三天，我們吃了一餐閻先生所訂的軍人飯。

軍人飯每天祇有兩餐，（官長公務員也同樣），分做早晚兩頓。早飯：每人



小米山藥且兩大碗。成分：小米五兩，山藥且十兩。做法：把山藥且切開，放在鍋內煮半熟，再放小米，以下按普通米飯做法製作。每人菜半碗。成分：山藥且四兩，豬肉二錢五分，食鹽一錢五分。午飯：每人十四兩麵蒸糰。成分，白麵半斤，山藥且六兩。做法：把山藥且蒸熟去皮，稍涼後再拌和于乾麵內，以下和普通糰做法同。菜半碗，與早飯同。山西省境內官兵公教人員，大都吃着這種改良軍人飯。在味道上說，也許有人認為不大美口，可是，各種食品所含的養份，倒絕對可以維持一個人的身體健康。我們在這裏所見到的人們，全都有着一副堅強的體格，蓬勃的朝氣，尤其是小朋友們，沒有一個不是穿得整齊，兩頰又紅又潤的。

山西大學的教育，便是將體育放在第一位的。其次是德育，智育居於最後。所以，這裏的每個人大抵都能適應環境。吃苦，耐勞，在他們看來，並不能算是一件奇蹟或光榮。

克難坡，公務人員和官兵，縱然在職務上有着大小的差異，而階級的觀念上，却彼此並無兩樣。一個高級的官員，並不敢認為自己的話一定發生效力，一個

民衆或士兵，隨便的也可以將自己的意見向縣長官去陳敘。

貪污，在這裏是絕對的不容許存在的。如果一個縣長有了不法的行爲，經過任何一個民衆或小學生的檢舉而證實，閩長官一定會予以澈底的處置。到現在爲止，被密告而查實罪行槍決的，幾乎每月都有五十人以上。獎勵人民檢舉貪污的官員，在山西實在是做得澈底。

困難兩個字，在山西省的境內是不容存在的，克難坡，便是克服一切困難的總樞紐，從陝西走入晉境，要跨過一段黃河，黃河上用鐵索架起的木板橋，便是困難中的一個奇怪的產物。這座橋，五年來在敵機不斷的轟炸下，始終溝通着陝晉的交通，不曾一日中斷。窯洞，更是克難坡上的一個奇蹟，一萬多人，沒有一間瓦房，大家全住在洞內，而洞裏窗明几淨，空氣流通，比之水泥鋼骨的建築，却並不見得稍有遜色。

奢侈，在山西是絕對沒有的事，尤其是在克難坡。香烟，在這裏早已絕跡；酒，除去政府招待賓客以外，在普通的場合裏，簡直休想找到它的蹤跡。整齊，清潔，樸素，緊張，是克難坡外形的軀殼，苦想，苦幹，任怨，任勞是克難坡內



在的精神！

克難坡真是個奇怪的地方。

一九四四，五，三十，於興集。

## 由重慶望延安

作者按：這篇文章是我根據八月十九日我在中央廣播電台播講的『西行漫談』寫給陸復初同志主編的現代導報的。寫這篇文章的原意，不過是想藉着我對於延安人民的懷念，反映出中共對於人民的壓迫，同時並藉着我對於重慶一般人民生活腐化的憎惡，表示出陪都言論出版行動的自由。不料原稿送審的時候，這點意思沒有被圖審會的同志所同意，說我對於重慶的指摘較延安爲尤甚，而將原稿不蓋章發還了。所以，我祇好將它收在這裏，以作爲這次旅行歸來的雜感。

『重慶的空氣，爲什麼這樣的污濁呢？爲什麼任何地方都嗅不到一點馨香的氣息？』在重慶居駐了五年多，使我對於這初具雛形的都市深深的厭惡起來。

延安歸來

101

換一個地方去呼吸一點新鮮的空氣吧！』這呼聲時時的在震撼着我的耳鼓。可是，當我一離開重慶踏進了延安時，我那美麗的夢幻，便又整個的被現實所粉碎了。延安的空氣，倒的確是要比重慶新鮮，但是我却又嫌它新鮮得過於稀薄了，稀薄得有點近乎同溫層的太空。簡直是連呼吸都感到困難。所以，在延安雖然祇住了一個多月，我却又急急的想念着再回到重慶來。

現在，我獨坐在嘉陵江畔的一角危樓之中，週遭的空氣，雖然還是那樣的污濁，而我的吸呼却已經恢復了自由。我一面爲着自己這次旅行所花費的時間深深的感到惋惜，一面却對於所謂『陝甘寧邊區』裏的一百四十幾萬同胞，深致其關切與懷念。

『願上帝賜福他們，使他們能夠生活在同溫層裏而不感到窒息！』提起『陝甘寧邊區』裏的一百四十幾萬同胞來，實在是可憐而又可愛！他們的生活是那樣艱苦，而他們的工作又是那樣的勤奮！他們像一匹駱駝似的在漫漫的沙漠中任重致遠，長途跋涉，他們從不曾問過這旅程還有多遠；也從不曾問過主人給了自己什麼待遇。從民國十九年起，共產黨便做了他們的主人，到現在，



經已是十五年了。在這十五個年頭中他們是經過了不少的變遷的。過去，在所謂『蘇維埃』時期，他們遭遇過劉志丹和高崗的恐怖的『土地革命』政策，如今，在所謂的『陝甘寧邊區』時代，他們又遵守毛澤東的號召，努力於『生產運動』的展開。毛澤東告訴他們說：『你們要抗日嗎？抗日便得要努力『生產』。』他們一致的點着頭說：『是的！我們要抗日，抗日便得要努力『生產』。』於是，在太陽還沒有爬出海峽時候，他們便荷起鋤頭去上山墾地。一直到太陽躲進山後打盹的當兒，他們才拖着鋤頭，蹣跚回家去走入睡鄉。因此，在『陝甘寧邊區』的區域裏，一片片的荒山變成了良田，一担担的『公糧』走進了倉庫。他們所得到的代價呢？雖然仍舊是三餐小米一套布衣，而毛澤東又告訴他們說：『由於你們努力『生產』的結果，現在你們已經是『豐衣足食』了。』他們聽了這話以後，同樣是毫不抗拒的一致點着頭說：『我們現在是已經『豐衣足食』了。』

這樣的人民，真是可憐而又可愛的，這樣的空氣，確是太寂寞而又太單調了。所以，當我受不住這低氣壓的窒息而匆匆的踏進了洛川的地界時，我的眼睛却是還在遙望着延安的同胞的，但是，我的眼簾內却深含着晶瑩的淚水，而我們的

內心裏，也充滿了無限的辛酸。

如今，我已經又回到重慶了，重慶的空氣永久是不會寂寞也不會單調的。我的呼吸，確實是舒暢了許多。可是，我眼簾內的淚水，早被五光十色的環境所吸乾，我內心裏的辛酸，也被那永不干淨的污濁的空氣所擠跑。

重慶確實是永不寂寞永不單調的，各報上不斷的有着『貪污案層出不窮』的消息，也有着『游資走向娼寮』的花邊新聞。坐在咖啡店裏吸着駱駝牌香烟的人物，會高喊着『物價飛漲，生活維艱』。大街上隨處可以買到的各色各樣的報紙和雜誌，却整天的在要求着『言論出版自由』。儘管有人在喊破了喉嚨，要大家『蔬食布衣，壓低生活水準』，而酒樓妓館却在積極的興建，高貴的舶來物品也不斷的從海外『飛』來。

這些，在延安是不會見到的。

『重慶的空氣，幾時能變得新鮮？而延安的空氣，又幾時能變得濃厚呢？』  
由重慶望延安，我不斷的這樣在想。



## 結語

寫完了『陝晉見聞』，作者個人心中，感到非常的沉重，這裏，僅就着個人的一知半解，再寫幾句內心裏久已要說的話作爲結語，雖然自己明知這些話也不過是老生長談，愚者一得，但是，在作者個人的職務上，總可以算是盡了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責。

(一) 黨團是我們抗戰建國的基本骨幹，如不加強黨團的組織與聯繫，提高黨員團員的素質與修養，何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果？今後，我們要加强黨團的組織，首先便要使得黨團之間取得更進一步的聯繫。讓團的幹部和黨的幹部在工作上有一個密切的配合，以造成黨團工作上的青年型的新風氣，同時，黨的先進們對於團員的工作更要予以經驗上的指正，對於幹部的認識也要予以理論上的提高。以改造黨團內的腐化份子，以肅清『由黨而官，藉團入仕』的錯誤思想的存在，使得黨員團員能夠深入民衆，協助政軍推行法令。

(二) 捨其所短，用其所長，是我國傳統的待人之道。在二十世紀的今日，

一切都趨於科學化，無論任何工作，更都有待於精密的分工，除去領袖聖賢。天下很少萬能的人物。所以，我們今後要在各地政治上收穫到優良的效果，一定要經過縝密的分工與密切的合作。幹部們在某一工作上有了成就，僅能在精神上或物質上予以獎勵，非視其能力絕對可以勝任時，不必提高其職位，擴大其權責。

(三)政府與人民直接發生最大關係者，除兵役而外，在農爲田賦，在商爲稅收。這兩件事都與人民的切身利益有關，所以執行上必須審慎，最好能使機構簡單統一，分層管理，對人民則必感莫大之便利，對政府亦可便於指揮，收效較速。如能加強各地方政府之職責，使之對於各該地之田賦稅收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中央政府再從而加以嚴密之監導與指揮，在節約人力物力上講，或亦不無可取之處。

(四)教育是國家百年樹人的大計，陳辭修將軍在西安接見中外記者西北觀團時，便曾嘆於教育之不能普及。戰時教育工作本不易辦；但是，在今日最後勝利將臨建國工作開始之際，在教育上正有着兩大問題亟待解決。第一：學校教育方面，急須舉辦大批職業學校，培養戰後收復失地時需用的中下級技術人員。



第二：在青年訓練方面，應該加緊訓練本黨的青年優秀幹部，養成其實事求是的精神，以爲實施地方自治的準備。固然，高級人員的教育訓練也一樣的需要迫切，而爲了中下級幹部的需要量太多，實不能不及早努力。

(五)宣傳，是本黨近年來最失敗的工作。黨辦的報紙刊物，不是與其他非黨辦的報紙刊物一樣，就是充滿了長篇的各執一詞的理論文章。非黨的人士固不願去看，黨內的同志，看了也無所適從。作者服務的商務日報，從社長高允斌先生起，以至於大多數的工友們，大概都是本黨的黨員和團員，歷年來在報紙版面上的文字表現中，在非黨或異黨的人士看來，也許覺得我們黨化得較黨報還要過火，一定是在受着黨的指揮；而實際上，這些表現却祇是我們這一羣青年同志，因爲在三民主義的教育中長成，所以形成的一種天然趨勢。究竟一個黨員團員主持下的報紙應該怎樣去辦？我們却從來不曾接到過黨的宣傳機關的指導。作者在商務日報工作，已經有五年之久，這五年中到底作對了幾件事？我們不會知道，假乎也無須知道；可是，我們相信做錯了的事也一定不少，我們不知道。却是應該知道的。商務日報是促進今後經濟建設的一個報紙，怎樣做才符合本黨的

要求，我們也沒有接到過一點指示。有時接到中央宣傳部的印有「機密」二字的通知，也祇是各報都有的一紙官樣文章。我們不知道政府的經建方案的內容，我們也不知道本黨經建計劃的準備，偶而，政府金融機關給我們送來一點的確不合事實的文章或消息，於是，我們便更感到不能不刊又真不能刊的苦痛了。這些，都不是不能改進，也不是不易改進的。

作者寫完了這幾點小小的願望，內心裏感到沉重而又輕鬆。作者深深的相信，我們有着聖明的總裁，有着賢俊的高級幹部，本黨的發揚光大與中華民國的抗建成功，一定會迅速的如期到來，如同作者每晚編完報後黎明轉瞬即臨的一般迅速。

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於重慶北溫泉數帆樓



# 附錄 (二)

## 西行漫談

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在中央電台播講詞

各位同志，各位同胞！本人代表商務日報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西北各地去參觀了兩個多月，今天能夠有這樣一個機會來向諸位談一談西行的見聞，個人實在覺得非常高興。

這次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西北各地逗留得最久的地方，便是陝北的延安。所以，現在我所要向各位報告的『西行漫談』，也就是祇限於在延安一個多月的見聞和觀感。

大家都知道延安是共產黨的大本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主席毛澤東，就經常的駐在延安，指揮着他的黨員和軍隊，統治着所謂『陝甘寧邊區』的一百四十幾

萬的人民。所以，一提起延安二字來，大家都不免有一種神祕的感覺。延安到底是地獄呢還是天堂？延安和重慶又有什麼區別？現在，我可以將我個人的遭遇和見聞，大概的向各位介紹一下！

陝北，本來就是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的地瘠民貧的一個所在，民國十九年到二十四年的這一段期間，又經過陝北土共劉志丹高崗等所謂的『革命』和『游擊』，所以就更鬧得十室九空，到處充滿一片荒涼景象了。一直到現在為止，這些斷壁殘垣的遺跡，還保留着不會洗去。

民國二十四年，毛澤東朱德由江西跑進延安，同劉高等打夥合作。陝北的局面，便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毛澤東到底比劉志丹等聰明一些，他們一到陝北，便鑒於當地的地廣人稀，祇要有勞力，就不愁沒有飯吃。所以，當時的毛澤東就不得不收拾起他在江西時所實行的那一套共產主義的『土地政策』，而也打起三民主義的招牌來，以號召陝北的民衆了。

從民國十九年到現在，共產黨之在陝北，已經有了十五年的歷史。在這十



年中，共產黨的「政策」，是有着不斷的變化的。無論是從「沒收土地」變爲「二五減租」，或是由「要求三八制」變爲「努力生產運動」，而陝北的民衆們，却依舊的保持着原有樸實和真誠。

現在，陝北的工人和農民，大概每天都有着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他們所得到的報酬，雖然僅僅是三餐小米一套布衣，而他們工作的勤奮，却始終是絲毫不懈。也許，在他們的內心裏，正深含着無限的悲苦和酸辛，可是，在共產黨利用「抗日必需努力生產」的號召下，我們却從來不曾聽到他們吐露過半句怨言。這種人民，真不愧是黃帝的肖子賢孫，真不愧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今天，個人在重慶遙想到陝北的同胞，真是不勝其懷念與關切。

談到陝北的民衆生活，在我們的眼光裏看起來，真是不知道已經低到什麼程度，他們所吃的小米，較之我們的平價米不知要壞到多少倍。他們以一年或兩年的過分的勤勞所換到的一件布衣，比起我們的買平價布來，更不知道要困難多少倍。但是，共產黨要他們說「現在已經是「豐衣足食」了」，他們於是就毫不抵抗的一致點着頭說：「我們已經是「豐衣足食」了。」

所以，當周恩來問到本人對於延安的觀感時，我就老老實實的和他說：『陝北民衆的勤奮，確實是遠較重慶爲佳，而自由活潑的程度，却遠不如重慶。』

當時，我同周恩來說：『周先生是到過重慶的，重慶民衆對於政府的批評，周先生也應該聽過。可是我們到了陝北以後，却從來沒有聽見過有人批評政治的好壞。中共的一切措施，人民當真的就沒有一點不滿嗎？就是記者團和毛澤東先生談天時，他也不曾斷然的承認。那麼，人民爲什麼不講呢？不用說，當然是由於『不敢』，中共是一天到晚在喊『民主』的，我想不到在中共『治下』的人民，竟然是這樣的沉默。我雖然不敢說這是中共的不『民主』所使然，而民衆自由活潑空氣的養成，中共似乎是仍要加點努力。』周恩來對於我的這個『建議』，竟然也表示了接受。

講到這裏，我想起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送給我們的大地圖來，在這張地圖上，全國的各省裏，大概都有用紅筆圍着的『中共軍事根據地』，祇有江西省的區域裏，却保留着一片潔白。江西爲什麼沒有共產黨呢？有人說，這是同患傷寒病一樣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一個人害了一次傷寒病給醫好了以後，便一生也



不會再發。這是爲了傷寒病菌有着免疫性的關係。傷寒病菌一侵入人體，除非是它永不離開，一直到那人病死，要是它一被醫藥驅走，他本身所遺留下的毒素，便會制止它第二次再來。拿這種說法來看共產黨過去的『政策』，確實是已經適用於江西，至於將來是不是也通用於陝北，現在，我們却還不能下一個肯定的斷語。

陝北的一般人民的生活，既是如此，一般公教人員和部隊裏的士兵呢？大致的情形也是這樣的。

前幾天，本人所代表的商務日報的社論中，曾談到毛澤東著的『財政問題與經濟問題』，我們曾指出共產黨現行的『財政經濟政策』是『開源』而不是『節流』。因爲他們要『開源』，所以不得不加緊的『生產』，所以，陝北的公教人員和部隊裏的士兵也全都要參加『生產』工作。

陝北的公教員，是除了管吃小米以外，沒有什新給的。據說是每人每年可以得到一兩套衣服。如果是除此之外還要買點別的東西或是抽抽紙烟，那非得另外『生產』不可了。所以，陝北的公教員除去辦公之外，還要種地紡紗。並且

，這種『生產』的收穫，並不完全屬於自己，其中還要提出一部份來繳給服務的機關。因此，陝北的公務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沒有家眷的，有的雖然也結了婚，而夫妻倆却仍舊是各過各的生活，很難組織一個所謂的『家庭』。

軍人的生活就更不用說了。我們所看到的三五九旅，現在全副的精力和時間，都放在『生產運動』上，所以『開荒』的成績也就特別的好。他們除了自己的衣食住可以全部自給以外，還可以繳給『公家』很多的『公糧』。因此，全旅士兵的手上，大多數全磨成了血泡。在洛川，我們便曾經遇到九個不堪忍受這種過分的勞力的榨壓而逃出來的士兵。

三五九旅是中共的精銳部隊之一，在陝北從事『開荒』，已經有了四年多的歷史。所以，他們有着一塊良好的墾區，叫做『陝北的江南』的南泥灣。這塊墾區的主人，便是旅長王震，他們更有着不少的『軍營商店』，叫做『團結部軍人合作社』，王震便是合作社的大老板。

提起王震來，這個人是非常有趣的。

有一次，記者團在延安縣的一家門上，發現了裏面有一幅內有『打倒國民黨



「字句的春聯，有一位外藉同業史坦因先生，對此事向王震提出了質問。王震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堅持着要到街上去找，結果，竟然給我們找到了果有此事，從街上回到我們的住宿地後，王震便羞惱成怒的罵記者團全是「特務」，當時，本人便和史坦因先生向王震提出了抗議，請他將所說的話收回，卻不知抗議的結果，竟然使他遷怒到中央日報的代表張文伯先生身上去。張先生剛剛站起來還沒有講到幾句話，王震便命令着他道：『我不准你說，你是中央日報的，要說，咱們單獨的到外面去談判！』他對於記者團這種強硬的仇視態度，隨我們怎樣解釋，他仍是始終不變的保持着，一直保持到和我們分手，似乎還餘怒未息。如果用毛澤東的話來批評他，他真可以說是一個「頑固份子」，毛澤東解釋「什麼叫做頑固份子」時說：『固者，硬也，頑者，今天明天，後天都不進步之謂也。』這幾句話，對王震用來，真是再恰當不過了，現在我們再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王震「真是頑固專門學校畢業的：他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還是頑固」。

最後，說到陝北的教員和學生的生活，那就更奇怪了。我們參觀過兩個學校，一個叫「延大」，是屬於所謂「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一個叫「醫大」，是屬

於十八集團軍『留守兵團』的。我們去的時候，並不是假期，但是，兩個學校却都沒有上課。大禮堂裏放着幾十架紡車，男女學生都在努力的爭取『紡紗突擊手』的頭銜。

我們對於參觀陝北學校的感想，可以改四句木蘭詞來加以說明。這四句詞是：『唧唧復唧唧，教授當戶織，不聞讀書聲，但見紡紗急』。

陝北的一般生活情形，既是如此的單調，那末，陝北一般人的心情又是怎樣呢？可以說他們的一般的心情都同生活的單調一樣的寂寞。因為延安祇有一家中共黨辦的解放日報和一家羣衆報，對於我們前方和後方的好消息，是從來不大刊載的，所以，陝北的同胞們對於我們前方和後方的情況，都異常的隔膜也異常的關切。

所謂『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蕭軍先生，和女作家陳學昭女士，都曾表示過願意到重慶來看看的願望。蕭軍更對記者團說出了他在延安的兩怕，一怕沒有社會生活，二怕寫了東西無處出版，這兩句話，是很可以代表一般人的。可惜，當蕭『參議員』這幾句話說了不幾天以後，解放日報的副刊上，便有人對這話



王民信  
549.427  
8051

2832901

提出了所謂的「批評」。此後我們沒有見過蕭先生，所以不知道他是否已經「坦白」一下來承認自己的「錯誤」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向各位的報告，祇好就此止住，說的拉雜而無條理，個人非常的覺得抱歉。如果諸位要想問一問：「延安到底是地獄呢還是天堂？」我想，在我這一段簡單的報告裏，各位一定可以用自己的看法來找到一個各個不同的答案。

延  
安  
歸  
來

一  
二  
七

單位：總圖書館 CP

來源：王民信教授贈

日期：97.05.29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832901

延安歸來

二一八

信  
427

1